

全球对话

12.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Shruti Majumdar 谈社会学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反思乌克兰 战争

Sari Hanafi

关于资本主义 的理论

William I. Robinson
Patricia Ventrìci
Esteban Torres
Fabrício Maciel

高等教育的 挑战

Johanna Grubner
Stephanie Ross
Larry Savage
Ka Ho Mok
Elizabeth Balbachevsky
Yusef Waghid

理论观点

Michael Burawoy

土耳其的 社会学

N. Beril Özer Tekin
Aslı Telseren
Dicle Koylan
Özkan Öztürk
İlknur Hacisoğlu

议题开讲

- > 从超全球化到永续合作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Völklinger Hütte
- > Karl Polanyi 谈右翼「民粹主义」
- > 从杀人犯的故事中学习
- > 巴西数位平台的货运工作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2卷 / 第2期 / 2022.0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本期的「社会学对话」中，我们访谈了 Shruti Majumdar。她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社会学家，目前任职于联合国终结对妇女暴力信托基金项目，专精性别暴力议题。在本次访谈中，她和访谈人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分享自己工作的经验，讨论社会学之眼如何在跨国组织事务上发挥作用。此外，她也为那些对于在国际发展领域结合学术与实践有兴趣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些建议。

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已超过半年，在此期间，我们见证了许多国际关系与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本期刊物邀请到国际社会学学会会长 Sari Hanafi 撰文，回头检视过去五年间的情势，带领我们一同反思于世界各地爆发的战火如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侵略战争带来的重大断裂。

第一个专题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理论，呈现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取径与观点。Patricia Ventrone 对科技变迁、不稳定化与工会化之间的连结提出了具体的分析；Esteban Torres 则将「世界化」概念引入资本主义理论，以解释日益复杂的全球阶级结构。Fabrício Maciel 以巴西社会为对象，说明在理解专制主义与右翼运动时，除了不稳定外，也应将贬低尊严与阶级的因素纳入讨论。最后，William I. Robinson 从全球视角呈现中心与边陲的地理阶层变迁，以及此变迁下各国内部加剧的不平等。

1990年代初期至今，新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的重构，使高等教育机构越发市场化。在 Johanna Grubner 促成的第二个专题中，我们将讨论在此背景下，正于各地发生的变迁。Stephanie Ross 与 Larry Savage 分

析当今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如何受新自由主义化影响，产生工作制度的商品化与重构。Ka Ho Mok 则分析东亚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化、劳动市场高度竞争下，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机会。Elizabeth Balbachevsky 讨论了大学在面对新民粹主义政府时面临的挑战，并说明在巴西，半自治的决策过程如何确保了大学的稳定。Yusef Waghid 批判性地审视随疫情而成为趋势的远距教学，并主张依据非洲的 ubuntu 精神，重新建构南非大学的运作形式——大学应该具有自主性，并与社会相互连结、定位。

「理论对话」则针对资本主义提出反思。Michael Burawoy 借鑑于 Erik Olin Wright 的真实乌托邦概念，系统性地与马克思及波兰尼的思想对话。他向我们呈现同时使用这三种理论取径的优势，同时揭示三者的共同追求：「将人类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的集体行动者将由谁组成？这是马克思、波兰尼与 Wright 留给我们回答的问题。」

本期地区专题「土耳其的社会学」由 N. Beril Özer Tekin 主导，其中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包含性别不平等、疫情下白领阶级劳动者与其工作／生活习惯、疫情对高龄者的影响、当今土耳其政府的环境政策取向等议题。

「议题开讲」中，Hans-Jürgen Urban 的文章，以及被赠与本刊的摄影集，深入阐述了工业的发展；Bruna de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则针对数位平台中的外送劳动提出见解。此外，本节也收录另外两篇文章，分别以波兰尼的理论视角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对犯下谋杀罪行提出社会学反思。■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主编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 [GD 网站](#)。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Raphael Deindl,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umita Tanjeela,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M. Omar Faruque,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yka Parvin, Ruma Parvin,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印尼: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Urszula Jarecka,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Anna Tur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rina Elena Ion, Bianca Mihăilă, Ruxandra Păduraru, Ana-Maria Rențea, Maria Vlascean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 李宛儒, 吕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楹,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本专题汇集了当前关于阶级、数位化、社会不平等议题的讨论与观点，以及资本主义理论为这些议题带来的见解。



本专题中的文章，分析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并探讨现今高等教育体系的转型过程及后果。



本期国家专题里的文章，分别针对土耳其社会学中不同领域的议题进行讨论，包含性别、科技和环境社会学等引人入胜的主题。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编的话	2
------	---

> 社会学对话

社会学如何抵抗对女性的暴力	
专访 Shruti Majumdar	
Sebastián Galleguillos, 美国	5

> 反思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普丁的帝国典范与欧美	
Sari Hanafi, 黎巴嫩	8

> 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资本主义与全球不平等	
William I. Robinson, 美国	10
拉丁美洲的平台资本主义	
Patricia Ventrici, 阿根廷	12
资本间体系：分子与有机阶级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14
不体面资本主义	
Fabrizio Maciel, 德国	16

> 高等教育的挑战

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化、市场化与不稳定化	
Johanna Grubner, 奥地利	18
后疫情时代下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	
Stephanie Ross 和 Larry Savage, 加拿大	19
高等教育与就业：东亚趋势	
Ka Ho Mok, 香港	21
在巴西民粹主义下的大学韧性	
Elizabeth Balbachevsky, 巴西	24
一所乌邦图大学的可能性	
Yusef Waghid, 南非	26

> 理论观点

真实乌托邦的必要性	
Michael Burawoy, 美国	28

> 土耳其的社会学

土耳其社会学：挑战与可能性	
N. Beril Özer Tekin, 土耳其	31
土耳其的性别平等／不平等与女性主义	
Aslı Telseren, 土耳其	32
土耳其的疫情与中产阶级消费	
Dicle Koylan, 土耳其	34
土耳其的环境主义社会学	
Özkan Öztürk, 土耳其	36
卷入土耳其意识形态冲突的女性	
İlknur Hacısoftaoğlu, 土耳其	38
土耳其的疫情和「数位移民」	
N. Beril Özer Tekin, 土耳其	40

> 议题开讲

超全球化到永续合作的路径选择	
Hans-Jürgen Urban, 德国	42
大自然的反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弗克林根钢铁厂	
Max Aulenbacher, 德国	44
为什么要向上看？Karl Polanyi 谈右翼「民粹主义」	
Sang Hun Lim, 南韩	47
从杀人犯的故事中学习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挪威	49
巴西数位平台的货运工作	
Bruna da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巴西	51

「我给新手社会学家的建议，是广泛地吸收跨学科、跨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并且，不要害怕问大问题。」

Shruti Majumdar

> 社会学如何抵抗对女性的暴力

专访 Shruti Majumdar



Shruti Majumdar 目前任职于联合国阿富汗女性办公室，是终结女性受暴基金的计划执行人。她曾在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工作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于印度、孟加拉、塞尔维亚、约旦与乌兹别克等国从事女性赋权相关计划的规划与研究。Shruti 拥有布朗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博士，以及德里大学 Lady Shri Ram 学院的社会学硕士学位。

本次的与谈人是 **Sebastián Galleguillos**，目前于约翰杰刑事学院就读博士班，并已经取得国际犯罪与正义的硕士学位。他同时是国际社会学协会联合国青年代表、智利塔尔卡大学刑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学术兴趣包含比较犯罪、社交媒体与犯罪、监禁的替代方案等。

SG: 可以和我们聊聊你现在在联合国的工作吗？你做这个工作多久、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SM: 我从2018年开始就在[联合国妇女署](#)底下的终结女性受暴基金计划中工作。我们支持并投资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试图终结对女性的暴力。联合国信托基金创办至今已经25年，在与女性权利相关组织及女性运动合作上有着深厚的历史。光是在2020年间，我们支持了150个由民间发起的计划，横跨71个国家／地区，其致力于多个面向的议题，包括：服务暴力倖存者，强化防止侵害女性权益的法律、政策与行动计划，以及透过消弭暴力与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来预防暴力的发生。

作为监测与评估专家，我的工作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我负责直接与民间团体联络，协助他们建立研究与评估能力、以数位科技作为计划核心。我帮助他们找到最为合适、安全、道德的方法，来掌握其计划对于社群的影响力。第二且最主要的工作，是试图在联合国妇女署中，建立研究对于女性受暴议题的功能与影响力。这部分的工作相当重要，因为对女性与女孩的暴力极为普遍——[在全世界，三个女性当中便有一个曾通报自己曾遭受来自伴侣／非伴侣的肢体或性暴力](#)，而这个数字于过去十年间并未改变。我们知道暴力是可以被预防的，因此从这些组织前线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中学习，是极为关键的。我也会参与研究计划的撰写、资源动员、管理外部研

>>

究团队，并与这些身在前线的组织进行知识生产；参与上述研究，也反馈到我对于这些组织的日常照顾中。总而言之，我必须持续地在社会学研究与发展实践中来回穿梭，这是我一直很热衷的事情。

SG：你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学习社会学，并在不同大学中取得了大学、硕士、博士的社会学学位；你如何将这些社会学的思考与技能，应用在联合国妇女署的工作上？

SM：的确，我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于正规教育体制中学习社会学，就连现在也还在精进自我。我是在2000年代初期取得德里大学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如同许多年轻的印度社会学者，M.N. Srinivas 的著作与他对社会学的信念，对我有很深的启发。他深信这个学科本身、其方法与工具，能够协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社会的结构与变迁。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对社会学研究有兴趣、想要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现实世界的问题。因此，在大学毕业後，我很快就搬到了美国，开始攻读布朗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布朗大学带给了我许多养份，协助我以发展社会学、跨学科工作应对世界现今的发展议题。在那里，我对结构暴力和社会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好奇为何某些族群在特定时间、空间更容易被边缘化（或受到动员）。当时我修习了量化方法的课程，同时也深受优秀的民族志吸引。在就读博士、于世界银行担任社会学家的期间，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在印度、孟加拉、塞尔维亚、乌兹别克、约旦、赖比瑞亚等国家的大型发展项目中，进行民族志研究。

如果要问我如何将社会学技能应用在联合国的实务工作上……老实说，我每一天都在使用它们。社会学视角对于女性受暴议题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促使暴力发生的社会结构与规范；和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创造相关计划；评估这些计划是否、如何能够如预期地发挥效用。你可以在[这边](#)找到我最近的成果，这是和来自全球、超过一百位的社会科学学者合作产出的一系列文章，以三个语言发表；文章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预防女性受暴，分析哪一种方案有最佳的效果。这是这类研究领域，首次有人尝试结合量化与质化方法，来解析那些特别困难的问题，包括：交织的脆弱性；相较于其他女性，特定女性为何较容易受暴；如何动

员社群以预防暴力；民间组织平时遭遇了怎样的困境或反弹，又如何发展出应对策略。总体而言，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属于公共卫生经济学者，其较常关注的是「什么」才能有效的终结暴力。以社会学研究分析其「如何」、「为何」有效，并探讨污名、权力、结构暴力等问题之后，我们得知，应该要做的，是更致力于发展长期、整体且可持续运作的相关方案。

SG：根据你的经验，社会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工作时，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你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SM：在我看来，机会是多于挑战的！不管是发展计划的分析、设计或是评估，社会学家可以提供很多帮助，也有许多借由跨学科合作并产出丰硕成果的途径。我目前能想到的几个挑战（有些是所有研究人员都面临的，有些可能是社会学家面临的），是要超越学科与学科间，以及发展的研究与实践间的界限。我们如何将社会学理论有效地用于实践？如何利用实践为理论提供资讯、又如何在两者之间创造更多的对话空间？

虽然两者皆身在议题的最前线，且需要互相合作，研究与实践却经常有着不同的节奏。对于顺利产出符合倖存者、受暴者或即将受暴者需求的方案来说，找到有效对话的方式是极为重要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快速导入研究，其能够以理论为基础，分析民间组织及政府平时处理的问题类型。说到这个，我很幸运地成为了世界银行[社会观察站](#)的成员，目前正于南亚进行革命性的嵌入式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要学习并记录民间组织的日常实践，并借此为社会学理论提供更多资讯，特别是女性权利组织——他们身在前线数十年，却总是难以找到办法记录自身的工作经验。

第二个挑战是专属于社会学家的，即如何以严谨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重新思考发展实践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几年前，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精彩且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果社会学家的影响力和经济学家一样大怎么办？〉](#)。如 Michèle Lamont 于文中所述，针对特定计划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经济学家有能力回答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社会学家参与计划的生产过程，被提出的问题将逐渐转向如何与为何，例如：由民间组织或政府领导的计划，如何、为何影响巨观的社会系统及结构。

>>

SG: 在联合国妇女署期间,你推动了哪些政策,来强化女性在疫情期间的权益?在你看来,有什么面向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SM: 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城,导致几种形式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加,尤其是亲密伴侣暴力(因为更多的女性被和施暴者困在一起)、非伴侣的性暴力、网路性骚扰,以及某些地区的传统习俗,例如女性割礼或是早婚、强迫童婚。在联合国信托基金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和许多民间组织合作,定期撰写关于这些趋势的文章,借此引起决策者和捐助者的注意。随着解封期限一再地延宕,各地的民间组织都将这样的处境视为长期的危机,开始为此准备临时的应对措施、尝试加强复原能力。那些规模较小、更基层的组织,需要有能够弹性运用的中心资金,才能有足够的力量运行下去,处理薪水、医疗保险、通讯、交通等支出。封城严重削弱了民间组织的能力,并威胁其生存。他们的空间被用于病毒的相关测试、庇护所与工作人员皆不堪重负,有些组织甚至关闭办公室、缩小规模,在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不得不选择裁员。这些组织的运作有其必要性:疫情期间,女性仍需要向当地的女性权益组织与社区机构求助,不管是透过WhatsApp、社群媒体、热线、人际网路,还是直接联络庇护所、自助团体的领导人、社区卫生工作者与辅导员、宗教领袖、律师助理。

为解决此问题,联合国妇女署借由筹备更多资源、向民间团体提供弹性资金等手段,来扩大对民间社会的支持。同时,我们持续倾听,并向他们学习¹。在目前的处境下,这些组织作为第一线接收到通报的人,能够提供我们大量有效的即时资料,而我们必须使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并一同合作以合理地运用他们。简而言之,倖存者的声音与草根民间组织必须是政策的起点,终结对女性的暴力,也应该要借着这个机会扎根于在地。

SG: 最后,你对那些刚在国际领域开始职业生涯的新手社会学家,或是社会科学家,有什么建议?或你受否有任何相关工作机会的建议或资讯?

SM: 我的建议是多阅读,涉猎不同学科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知识。不要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太过庞大!借由理论知识与方法论工具,社会学家绝对有能力以深思熟虑且具批判性的方式参与于发展实践的推动。疫情的经验,使我们认知到性别平等进程的脆弱性,以及其面临的挑战有多庞大。如今是个关键的时刻,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必须针对各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做出深入、长远的改革。我们要产出更多考量整体的方案,将根深蒂固的父权体制与性别不平等,视为需要克服的挑战。此外,我们需要反思: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创造、体现并使父权体制系统得以存续?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与时代,对其作出可存续的改造?我相信社会学家在研究与实践中,都能为此贡献。

我也鼓励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社会学者,尽量多累积一些实务经验;参与联合国的国家级计划,可以有效地使你对复杂的发展议题,有更多基础的理解。类似的工作机会可以在[联合国职业网站](https://www.un.org/zh/employment)上找到。除了对实务领域的近况有基础的理解,随时跟进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也相当重要。这对于想要同时在学术与实践上有所掌握的人来说甚是重要。谈到这里,我也得强调ISA这类组织的重要性——身在其中能够使你有更多向同侪学习的机会,随时跟进学术发展、推广自己的研究,甚至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想要串连那些身兼学术与实践工作的社会学家,向他们寻求帮助时,请不要犹豫。我发现和母校的校友保持联络,在理解工作性质上有很大的帮助。直到现在,他们都仍然于我的支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协助我在这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的领域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來信寄至:

Shruti Majumdar

<shruti.majumdar@gmail.com>

1. [联合国妇女署\(2020\)由下而上的声音:疫情对于女性受暴议题的冲击。](#)

> 乌克兰、普丁的帝国典范与欧美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国际社会学学会会长(2018-2023)



来源: Pixabay / 创用CC。

近日以来,俄罗斯进犯乌克兰的事件震惊世界,其不仅是一场独立战争,更具有许多特殊性——这场战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成为一场核武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侵略的举动深具挑衅意味——或至少如巴勒斯坦哲学家 Azmi Bishara 所言——是下定了决心要开战(2022)。然而,这并不代表侵略行为与践踏其他国家的主权是具有正当性的。国际社会学协会在战争刚爆发时及发表声明¹,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表示关注。不管是对国际社会学协会还是对我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其违反了我们一贯拥护的价值与信念。国际社会学协会将与乌克兰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全球各地的学者站在同一阵线。我们也支持身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的同侪,他们为抵抗这场战争而发声,致力于保卫民主与人权²。

> 普丁的帝国典范

普丁领导之下的俄罗斯,持续地对人类长久发展的自由民主理想造成破坏。自2000年掌握政权之后,普丁积极地对那些试图民主化的国家(乔治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发动战争。此外,普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美国的权力展示行为(如入侵伊拉克),但两者还是有差异——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确实是个独裁政权;而乌克兰内部即便针对加入北约有歧异,但其仍然是个民主国家。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乌克兰有超过半数人赞成加入欧盟,赞成加入北约的人则不到一半(Bishara 2022)。这种矛盾的立场其实是明智的,因为他们考量到俄罗斯抱持着糟糕的「强权民族主义」(great power nationalism)。大国民族主义以三个要素为基础:由东正教会与沙皇形塑的俄罗斯认同;将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视为一体的斯拉夫民族性;以及与前亚洲苏联共

和国和中国结盟为「欧亚大陆」的概念,其有助于建立俄罗斯的雄伟形象。19世纪的沙皇俄国,曾被马克思称为欧洲的反动堡垒;普丁手中民粹主义式的俄罗斯也试图扮演这个弱势的角色³,即便此时的俄国早已不再是经济上的弱势。不久之前,我才亲身经历了俄罗斯与伊朗于叙利亚的战争,并见证了俄罗斯的真面目——这是一场超越民族国家与身份主义,由「雄伟地域」所发起的,权力投射的实践;其基础是一套反映了普丁以自身为中心、帝国典范的世界观。Carl Schmitt 曾为普丁典范进行分类(Lewis 2020),俄罗斯哲学家 Aleksandr Dugin 协助普及。

> 四项反思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以及一个生活在中东的人,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和读者分享四个自己从这项战争中得出的反思。

第一,是欧美的国际关系论述与实践之间有着双重标准。在谈论全球南方时,反抗、抵制、团结的斗士等词汇是禁止使用的,不过在描述乌克兰战争时,同样的词汇却带有正面的意思。正如伊斯兰社会学主席 Lev Grinberg 所述⁴「以色列军事佔领巴勒斯坦领土五十五年,明明是违反国际法,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对其发起制裁?」许多学者公开支持在机构与个人层面全面地抵制俄罗斯学者;然而当巴勒斯坦对西方国家发起抵制、撤资、制裁等运动时,人们却将其视为犯罪行为。

第二,是相较于乌克兰战争,在其他地区发生的残酷战火,怎么就没有引起欧美国家同等的注意呢?作为一个在叙利亚长大的巴勒斯坦人,有许多不同方式可以描述我至今的生活。其中一种,是我在一个只有短暂和平的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争,例如:1967年、1973年的以阿战争;2000至2005年在巴勒斯坦领土发生的以色列战争——二次革命;2008、2012、2014、2021年的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战争;1982、2006年在黎巴嫩的以色列战争;1980至88年的两伊战争;1991年的科威特;1991、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至今的叙利亚战争;2014年至今的叶门战争;2014至2020年的利比亚战争。这些猛烈的战火造

>>

成的大规模破坏、痛苦、流离失所与死亡，远远高于乌克兰战争。面对这些战火，西方大国却一直没有太大的反应，经常以稳定、经济等名义支持殖民国家（以色列）或独裁者（海湾和埃及）。

第三，某些将焦点放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或是现今欧美新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评论文章，似乎都忽略了有其他正崛起的帝国，更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征服其他地区时有多么残暴。俄罗斯、伊拉克、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国家，皆是对中东有极大影响力的帝国，其中几个国家的军事行动更促成了殖民主义、悲剧与独裁主义的形塑。Laura Doyle 提出的「帝国交互性」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她认为帝国具有连续性，且往往在平行的运作下，产出了「当代帝国历史中共构、极度非预期、互动性的政治，以及其未曾预料的、有时甚为讽刺的效应。」（Doyle, 2014）因此，在这些如植物根系一般，有着层层交叠的脉络与动态的帝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并非只是单纯的连锁效应，事件往往互相影响，且是座落于特定的制度处境之下，背后有着策略性的追求。

第四，呼吁要支持全面抵制俄罗斯或巴勒斯坦的学术，是违反学界所追求的价值。我相信面对任何有殖民或独裁色彩的机构，我们肩负着发起制度性抵制的道德义务，但我并不支持在个人层次发动抵制。让相关机构中的个人参与在讨论中，对于理解面对冲突的不同观点，以及保持开放、积极的对话与沟通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意味着，光是支持那些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是不够的——身在学术界，我们必须仔细地倾听那些在各种程度上拒绝拥抱这类理念的人，并扮演好中介的角色，实践兼具情感、道德与政治性的策略。我反对激进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并认为应该要将处境纳入考量；在批判权力的同时，必须能与我们批判的对象展开对话。很明显地，学术论述的开展应该遵循某些与知识完整性及社会责任有关的规范。这样的责任可以预防宣传、煽动、妖魔化他人文化与仇恨言论发生；也正是这样的责任，使得学术自由的意涵，不只是其宣称的「人人有表达自由」这么简单。学术的功能，是将政治从 Schmitt 所描述的那种朋友／敌人概念中解放。（此概念中，最高程度的连结是愿意与群体的其他成员一同战斗、死亡；最高程度的分离则是愿意杀死敌对群体成员。）我完全同意历史学者 Amit Varshizky——如果要使政治自由主义生存下去，便要认真对待敌对批评者的想法，而非轻蔑地否定。德国哲学家 Ernst Cassirer 也在二战后指出：「为了打击敌人，你必须了解对方。这是一套完善策略的首要原则之一。了解敌人指的不只是理解其缺陷，更要理解其强大之处。我们都可能低估敌人的强大……，应该深入研究政治神话的起源、结构、方法与技艺。我们应该与对手面对面，以找到打击对方的方式」。⁵

> 结论：强化团结

我想在最后提醒大家，在决定面对社会受苦时，我们应该将人道的道德推论，与 Mauss 在礼物一书中描述的那种人与生俱来对社群的关爱互相结合，以促进血缘、邻居、国家甚至人类整体的团结。并且，我们应该以全体人类最高等级的团结为目标，如 Jan-Christoph Heilinger (2019) 的「世界性义务」那般。我们必须承认，欧洲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呈现出其团结并不是世界性的，而是由文化、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民族主义认同作为动力。我提出这些反思，是为了化解那些出现在学术界、大众媒体上的评论；其批判我们相较于乌克兰，在面对叙利亚、阿富汗、非洲难民时有极大差异。我们必须注意到，借由不同道德推理，将能预防任何试图将复杂问题简化的情况；例如将不同的待遇归因于纯粹的种族主义⁶。西方学者应做好心理准备——是时候接受阿拉伯与穆斯林在文化、宗教上与西方之间的亲密性，而不再将其视为危险的教派主义关系。■

来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参考文献

- Bishara, A (2022) "Russia, Ukraine and NATO: Reflect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to Not Avoid the Road to War." The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 Doyle, L (2014) "Inter-Imperiality: Dialectics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History." *Interventions* 16 (2): 159–96.
- Heilinger, J-C (2019) *Cosmopolitan Responsibility: Global Injustice, Relational Equality, and Individual*.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 Lewis, DG (2020)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Putin and the Politics of Order*. First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ttps://www.isa-sociology.org/en/about-isa/isa-human-rights-committee/isa-statement-on-the-russian-military-offensive-happening-in-ukraine>.
- 国际社会学会也在网站上增列了所有机构的反战声明，包含国家社会学协会、研究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协会，以及乌克兰社会学协会)清单
- <https://litci.org/en/once-again-bastion-of-reaction/>.
- <https://www.972mag.com/ukraine-lebanon-russia-israel/?fbclid=IwAR0Qq6eemWkOmPJfjzIP0l5VAeOmCpPHmYQUKew7RwXHO1vDjZ6LDxtts>.
- <https://www.haaretz.com/world-news/premium.HIGH-LIGHT.MAGAZINE-to-understand-putin-you-first-need-to-get-inside-aleksandr-dugin-s-head-1.10682008>.
- 当然，这种批评有些是有道理的。可以参考 H.A. Hellyer 的文章〈Coverage of Ukraine has exposed long-standing racist biases in Western media〉。<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2/28/ukraine-coverage-media-racist-biases/>.

> 资本主义与全球不平等

William I. Robi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美国



迦纳的都市街景中，贫穷无处不在。
来源: Jenna/Flickr, 创用CC。

国际发展机构乐施会(Oxfam)指出,2018年全球前1%富有的人们获得了全世界52%的财富;全球前20%富有的人们,佔有了全世界95%的财富;而其余80%的人们,只有5%的财富来维持生活。这样不平等的状况在乐施会发布调查报告时,已是如此地骇人听闻,而近几年,这种现象更是持续地恶化。在2021年,乐施会做了后续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头六个月,全球富豪的财产有10亿美元的惊人剧增,且在疫情期间,每个国家财富不平等的情况皆严重加剧。

> 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不平等的发展

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拥护者意见相左,研究不平等的激进社会学者观察到这种社会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因为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财富的方法,他们尽可能地将社会集体生产的财富作为利润佔为己有。此外,资本主义在这500多年间不断地向外扩张,透过不断地寻找新机会,达成资本积累(使利润最大化)作为它得以一直存在的方式。资本主义从西欧的中心地带扩张出去,透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近期的全球化

>>

浪潮，最终吞噬了整个地球。至21世纪初，已没有任何国家或是人民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社会学者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紧密交织的两种不平等形式，一种发生在富人与穷人间，如同乐施会的调查指出是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另一种则是将全球人们分为富人与穷人或是国家间不平等的阶层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刚果的人均年收为 \$785 美元，然而在19世纪末殖民刚果的比利时，人民的人均年收入为 \$47,400 美元。在学术词典中，全球的极化源于殖民主义将世界分为以西欧、北美、日本为核心的「第一世界」富裕国家，而像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遭受殖民且被的核心国家支配的区域，则被边缘化归为「第三世界」。近年来，学者和专家将早期的第三世界指称为全球南方，第一世界则称为全球北方。

根据 Karl Marx 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 V.I. Lenin 提出的帝国主义经典理论，还有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在二战后期间皆发展了新的关于依赖性、世界体系和低度开发的理论。他们说明，殖民主义组织世界经济的方式是使边陲地区生产的财富被虹吸回核心区域，造成前者变赤贫，而后者变得富裕，这样的模式解释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不平等。因此，他们表示资本积累在空间上是不均匀的，且使得一些人们生活在已开发的环境，另一些人们则处在未开发的环境。

> 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变化模式

然而在世代交替之际，新的趋势对于轻率地划分国家与人民的情况产生了质疑。首先，一些前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在工业化后也加入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等富国俱乐部。第二，即使在最为贫困的国家中也涌现了强大的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重要的高消费力，他们都被整合入全球消费文化中。第三，在传统的富裕国家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期，但由于现今的全球化，他们面临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也面临迅速地向下阶层流动的问题，这些都逐步破坏了他们曾经安稳的生活。因此有些社会学者指称这些工人阶级面对了「第三世界化」的困境。

瑞士银行UBS近期发布了一项调查，指出世界上多数的亿万富翁都在美国，但整个亚洲的超级富豪人数正迅速地增长。以中国来说，它现在佔有全世界亿万富翁的五分之一那么多，且每周都有两个新的亿万富翁诞生。另外，巴西、墨西哥、印度、沙乌地阿拉伯、埃及等，以及其他属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资本家们都在当今全球经济市场中投资了数兆美元。此外，富比士的调查显示，比起其他区域，前第三世界中那些超级富豪的资产正以飞快的速度向上成长。如「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孟加拉的超级富豪俱乐部增长了17.3%」而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增长率为13.4%，而越南的增长率为12.7%；肯尼亚和印度则分别被记录了11.7%和10.7%两位数的增长。」

有些人根据这些趋势提出论点：与其按照地理区域或是领土的方式说明，还不如使用跨国人口群体去指称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更为合适。从此观点来看，全球南方不只包括了前第三世界的贫困者，也象征性地指向在富裕国家的穷人与被排斥者；而全球北方则指集中在传统富裕国家中掌有不成比例权力与财富的富人们，以及全世界维持、管理和享受权力中心的强人们。即使社会学者持续地争论着这些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以任何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将财富向下彻底地重新分配给世界上多数的贫穷的人。而无论我们意愿为何，这都需要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当权者进行对抗，因为上述乐施会报告中提到的那百分之一的人类，也就是控制全球经济的跨国公司精英将会抵制任何对于他们财富和权力的挑战。■

來信寄至：

William I. Robinson

<w.i.robinson1@gmail.com>

> 拉丁美洲的平台资本主义

Patricia Ventrici, 劳动研究中心(CEIL-CONICET),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阿根廷



12

一位乌拉圭的零工劳动者。外送服务是数位化与不稳定之关系的案例之一。

来源: Ted McGrath/Flickr, 创用CC。

技术公司令人眼花缭乱的成长,因疫情的爆发而呈现指数性成长,放大了平台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并加深了围绕在全球南方的资本、劳工以及其变异的一些辩论和现象。

> 数位化的菁英制和「飞跃式发展」

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例如阿根廷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提供了一个

历史性的机会,以实现渴望已久的「飞跃式发展」,并且在国际框架下取得新的地位,这样的公共论述正在逐渐被巩固。该地区的某些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能够发展全球尺度的数位公司(被称为独角兽,它们在美国股票市场的交易额可以超过一亿美元)正是这种论述的基础。

此外,这种质变将由一个新的企业精英领导,他们在加州精神中成长,与当地传统的寡头政治相对立,而后者则主要与农业有关,并在较

>>

小程度上与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领域有关。这批新的年轻领导人，顾名思义是受全球性的使命和精神的驱使，并以当代的主流语言为母语，将自己定位为与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对立，后者的特点是永远依赖国家补贴的精英，缺乏竞争、省级的、保守的、过分僵化的，而且总是有点不合时宜。

这样一来，梦想中的熊彼德经济终于可以通过数位菁英制的魔法降临在这些纬度上。数位经济的生态，表现为对以租为本的旧有寡头制的超越。初创企业和独角兽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新名词，对我们这些边陲国家来说是渴望的。

> 双面未来：数位化和不稳定性

然而，这种类型的企业在该地区急速但仍处于萌芽的发展状态，显示了一个支离破碎和对比鲜明的现实，即数位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间产生的连锁效应。这种社会两极化的运动除了在各种层面上，也在数位平台对于劳动世界所产生的重构上，非常明显。目前，关于该地区「未来工作」的辩论被两个明显对立的形象所主导：一方面是与软体产业相关新工作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应用程序获得需求的平台工人（Uber、Glovo和Rappi的司机、家务服务等）的高度不稳定性。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种人是高水平的，即使考虑到他们以美元为单位计算的工资，他们的工资是明显便宜的，但他们所享有的工作条件在当地是优势的，而这主要是由于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软体工程师、网页设计师、资料科学家、系统分析员）是相对缺乏的。对于需要劳动力来扩大业务的在地公司来说，这种缺陷构成了主要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微型工作的极端不稳定性意味着必须加强放松管制的模式和劳雇关系的极端灵活性。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意味着在劳动保障层面的伟大历史成就的瓦解。在这个方向上，工作平台化的进展为劳动力市场中极高的非正式性结晶做了有力的准备，在那里，这些新型的「独立」工作是一种新事物。

> 划时代的演讲：企业家精神

在象征性操作的层面上，有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将这些在物质上如此遥远的层面联系起来，也就是创业语言。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企业基础的象征性建构，已经变成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其中平台公司是最好和最有效的化身。它需要在一个超个人化的主体形象中证明其价值，在一个绝对不受社会条件限制的幻觉下，以自由、大胆、创新、自主、风险和超生产力的漫无边际的想法为动力。该地区的大型技术公司在这种话语装置中找到了一种工具，它能非常有效地构建一种有利的常识，这种常识强烈地渗透到社会结构最遥远部门的世界观中。在拉丁美洲目前深刻的危机背景之下，创业精神以其技术—自由—数位精神，实现了晚期的新自由主义。

因此，在最低限度社会支持的崩溃和企业不可预见的资本集中这些背景下，自由，基本上也就是市场自由，这个广为流传的概念，与对其不断加剧的辩护之间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而在边陲资本主义的「失败」国家中，更是如此。创业语言的操作试图将不稳定的日常经验的痛苦转化为风险的肾上腺素，并将困境转化为所谓的个人机会。这种对「赋权」的赌博演变成了社会受苦的私有化和对主体的更高层次的责难，他们被贫穷的物质条件和尚未实现的超生产力所加倍地束缚着。

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增加了新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产生了新的常识和集体组织的视野。工会和社会运动，是抵抗的主角，是这一挑战的主要行动者。但他们的潜力，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刻，取决于他们解构不合时宜的逻辑的能力，以及重新塑造能与正在发生的困境相匹的集体形式。■

來信寄至：

Patricia Ventrici

<patriciaventrici@gmail.com>

> 资本间体系：分子与有机阶级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为了解释社会变革进程的进展，有必要关注世界占有游戏 (world appropriation game) 的历史演变，它同时发生在社会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全球领域¹。我可以把WAG，或世界权力游戏，定义为一个可变的互动领域，它是在六个历史系统的交叉点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系统、国家系统、通讯系统、种族系统、父权系统和自然系统。资本主义体系构筑了19世纪以来社会世界的核心物质层面。这使得它，用简化的话说，成为了统治系统。

由于WAG的演变，资本主义体系所经历的核心变革是它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阶级结构。有关的社会阶级与马克思和韦伯典范概念化的，十八、十九世纪的第一批欧洲工业城市的商业集团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的核心是由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简化对立关系来定义的，那么今日社会世界中的阶级结构则主要是在分子阶级和有机阶级之间的辩证基础上去做定义。如果说前者的关键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那么决定后者组成的首先是收入的来源。

> 分子阶级

分子阶级可以被定义为个人的依赖和经济配置模式，首先与他／她的收入结构有关。分子阶级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至少从二十世纪末开始，社会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领域都被某一个分子阶级结构所塑造。

在这种结构中，可以区分出四种类型的阶级：利润依赖型阶级、劳动依赖型阶级、救助依赖型阶级和犯罪依赖型阶级。在任何时候，界定一个人是否属于某个分子阶级的是他／她的主要

收入来源。如果主要收入来源发生变化，个人就会被「重新分类」。反过来，每个人不仅在某一时刻属于某一分子阶级，而且属于该阶级的某一层级。

一个人的阶级层次是根据与收入的量相关的经济地位来定义的。截至21世纪，在社会世界的国家范围内，有可能确定存在着五个阶级层次。由上而下，我称它们为顶层、上层、中层、下层和底层阶级。属于顶层阶级的人是超精英阶级的一部分，是日益增长的、令人不齿的亿万富翁的世界。属于高阶层的人是下层精英的一部分。这一对顶级阶层构成了精英领域。另一方面，属于中层、下层和底层层次的个人则构成了大众领域。后者是一个具有重要内在差异的领域。

因此，与现代阶级理论所提出的不同，阶级不是层状结构的指标；每个阶级都是分层的，每个层次都是在不同阶级上的层次。一个分子阶级可以在一个以上的层次中实现，一个层次可以汇集一个以上的阶级。

> 有机阶级

如果说分子阶级关系源于每个国家领域内的，个人阶级之间的结构和互动模式，那么有机阶级关系则是基于全球领域内的，国家和地区阶级之间的结构和互动模式。一个有机阶级相当于一个国家和/或地区的分子阶级结构。有机阶级是一个国家系统的从属和经济配置的模式，主要是根据其收入结构来定义的。通过意识到有机阶级的世界网路的存在，我们就有可能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般和单一的概念转向资本间体系的概念。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一个

>>

「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系统』是个庞杂的体系，是一个不对称互动的资本主义体系式的系统。」

不对称互动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其组织形式上有内部差异，但在其抽象的最大化逻辑上没有区别。

在资本间体系中，有三种典型的有机阶级互动：（一）知识依赖阶级（资讯资本主义）、（二）产业依赖阶级（工业资本主义）、（三）商品依赖阶级（商品资本主义）。反过来，也能够辨识出现存的两个相互决定的有机阶级层次：核心和边陲。一个次区域、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从属于这两个层次之一的事实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反映了其全球经济地位。

自19世纪资本间体系的世界化²以来，知识依赖和产业依赖两个有机阶级在核心层次中复制；而商品依赖阶级则在边陲层次中复制。因此，国家或地区的阶级是根据其有机阶级和其层次的双重身分来界定的。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有机阶级定义了分子阶级这个世界的物质性核心。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或者说所有的阶级个体，都是从一个核心或边陲系统中重新创造出来的。这样的定位意味着有一个额外的物质性的决定来源，具有超越个人的特征。因此，社会世界中每一个阶级下的个人都是从一个双重从属和双重配置、分子和有机的角度来配置的。

自198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化的进程一直在扩大，这也与资本间体系的阶级结构的日益世界化有关。随着这种扩张，阶级不平等不再仅仅是不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中个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在核心上，也代表了世界分工中国家和地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新的取径上，分子阶级和有机阶级不被认为是行为者。与现代社会阶级理论不同，阶级中不存在固有的行动逻辑。个人的阶级和国家的阶级都不是社会行动者，更不用说有预定的倾向了。至少自 Bourdieu 以来，这一社会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个人的阶级在实际行动时成为个人行动者，而当他们创造或将自己纳入公司、国家、工会、社会运动等时，他们成为集体行动者。如果不考虑这个世界阶级结构，社会行动是无法解释的³。■

来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mailto:esteban.torres@unc.edu.ar)

1. 在这里，「全球」和「世俗」之间的区别具有核心意义。根据我的理解，全球是以扩张或收缩的方式从社会世界的每个国家地点那里所形成的单一领域，而世俗则是从全球领域的集合中建立的。更确切地说，世界性是由国家、地区的和全球范围的领域构成的（参见Torres E，〈World Paradigm. A Proposal for Sociology〉，〈Global Dialogue 11.1〉，<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uploads/imagen/2238-v11i1-chinese-traditional.pdf>，pp. 40-41）

2. 社会世界的扩张，不同于全球化。

3. 这资本主义理论将在新书《The Intercapital System: The New Economy of World Society》（资本间系统：社会世界的新经济，即将出版）。

> 不体面资本主义

Fabrizio Maciel, 客座教授,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国

理解资本主义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体系，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整个二十世纪，人们曾经多次对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尝试进行定义和分类。如今，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系统的技术层面已经显现出了最有侵略性的一面，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了一种新的数位底层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新冠病毒下的疫情使世界各地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清晰和深刻。

为了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需要摆脱以政治小说化为基础的、对现局的幻想。这已经成为全球主流媒体的主要专长，将政治领域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奇观，并系统性地隐藏了经济领域正发生的事情。在此，我们需要重构将我们带到现在这个时刻的，更加庞大的结构性与历史事件。

> 全球底层阶级的崛起

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就如 Karl Polanyi 的著名表述，资本主义已经历了一场「钜变」。欧美福利国家在经历了辉煌的30多年后面临垮台，是理解这个「勇敢新世界工作」的主要起点，正如 Ulrich Beck 挑衅地定义。

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仍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其促进社会正义的能力。随着福利国家的失败，以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核心国家的不稳定工作为指标，人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将永远不会是一个能促进任何正义的系统。

从那时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建设已经在全球范围开始，我称之为不体面的资本主义。它的主要招牌便是在边缘和核心国家中都生产出了全球性的底层阶级。底层阶级的存在一直是边缘国家，甚至整个大陆的印记，例如拉丁美洲和非洲。如今，随着移民的大量到来，也由于核心国家和大陆大众阶级的内部贫困化——如美国与欧洲——全球底层阶级的生产成为不体面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在此情况下，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就专精在生产并自然化人类生命价值的缺陷。例如，巴西宪法中尊严的概念提醒我们，个人需要维持其物质生存和道德存在的最低水平。当这种最低限度的需求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或国家政策的保障时，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是在定义全球底层社会生活的屈辱状况中沉沦。在巴西，这种没有任何工作的底层阶级达到了经济活动人口中的30%，正如 Jessé Souza 所定义的那样，生活在次等公民的状态中。另外有30%的人，是不体面的工人阶级，在我们通常定义为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中生存。

> 不稳定或尊严？

不稳定和不稳定工作的概念值得我们反思——它们只是描述了明显不好的情况和工作条件。我提出不体面工作的概念，正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阐明当今世上数百万人所经历的物质性悲剧、屈辱性的道德及生存状况。以巴西为例，30%的人口生活在尊严的边缘，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一些工作，即使是不体面的工作；另外30%的人则在尊严线以下，因为没有任何工作。

>>

「大多数巴西领导阶层在2018年的选举中,仍然倾向保有基于极端菁英市场心态的威权主义情绪。」

将视野放在欧洲,特别是法国,Robert Castel 为理解不体面的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观点。对他来说,福利国家的衰落意味着薪资社会的断裂。其主要特征是社会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市场驱逐了越来越多的人,而没有为他们的加入创造新的条件。其结果是作者所说的「剩馀」的社会生产,也就是欧洲的底层阶级,现在将成为全球底层阶级的一部分。

> 不体面的资本主义和极右翼

在这种脉络下,我们需要研究不体面的资本主义与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崛起的极右翼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打破普遍的理论,即是左派及其政党的错误使得新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再一次,我们需要破除对现状的幻想,重建置我们于此的深层结构分析。

在德国的案例中,Klaus Dörre 显示了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加以及坚定极右翼的心态与情绪之间的直接联系。有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威权主义是不体面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尽管它可以在偶然的情况下加深不体面,就像在巴西和当今世界的其他几个国家。

因此,当大众阶级因为害怕被迫陷入不体面的状态而坚持威权主义情绪时,统治阶级则因为害怕失去他们有社会保障的特权状态而与威权主义调情。这就是我多年来对巴西领导阶层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所显示的。凭借特权阶级的出身、高薪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数巴西领导阶层在2018年的选举中坚持了基于极端菁英市场心态的威权主义情绪,这在 Jair Bolsonaro 的论述中明确体现。

现在,随着政府的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屈辱感加深,与它在疫情面前的死亡政策相联系,巴西人民正在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Lula da Silva 在2018年因巴西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和法律欺诈而被捕,现在在2022年出现在总统投票意向的第一位。我们将看到,在不久的将来,这段不体面的历史是否会出现一些逆转,以及世界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來信寄至:

Fabício Maciel

<macielfabricio@gmail.com>

> 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化、市场化与不稳定化

Johanna Grubn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奥地利, 以及《Global Dialogue》助理编辑

发轫于1980年代的根本性钜变被视为新自由主义起启动经济、政治与社会重构的原动力,而高等教育部门及大学作为其整体重塑的公部门之一,自1990年代以降渐渐受到经济化及新自由主义化的渗透,在许多国家都可以发现从国家官僚体制的监管转向市场、经贸组织及调控机制的现象,后来也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后果。

这样的转变可能与下列三点相关:一,在许多国家中,在自由选修的前提下,标准化的学程与其规范是基于个人兴趣而决定,也全然地改变了学生过往的学习模式。与此同时,大学经历普及化后,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学历本身却贬值了。二,在许多高等教育体系中,雇用制度已经完成了从福利国家到工作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因此导致其不稳定。借着高效地提高生产力,针对大学及学术机构的市场化排名,这样的竞逐创造并增加了一类的工人主体,似乎也与弹性、放任的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安排相互绾结。三,毕竟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些新的要求对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安排产生了影响,表现为性别中立。从结构上来看,人们会更青睐那些有着良好时间掌控能力,而不需担负照顾责任的人。

本专题中的文章拣选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转变及趋势,并聚焦在这些趋势导致的不同结果。在最初的贡献上,Stephanie Ross 和 Larry Savage 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在加拿大高等教育部门对高等教育商品化以及工作制度重组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其观察大学针对疫情所做出的应对措施、机遇与显而易见的改变必要性。Ka Ho Mok 则关注东亚高等教育机构的]普及化对毕业生工作机会的影响,他探究这



| Arbu 绘制。

种发展所带来的高度竞争劳动力市场及其后果。Elizabeth Balbachevsky, 她的研究论及大学所面对的新民粹政府挑战在于政府试图击垮了高等教育体系而非转型。她展示了巴西的大学中,半自治的决策过程可以确保大学的稳定,尤其是遇上政府失灵导致行政部门垮台。鑑于远距教学的批判,Yusef Waghid 挑战了,疫情下,大学成为只负责知识转移的机构。并提到(南)非洲大学在非裔民族的乌班图(ubuntu)伦理下,使得大学的自治机构同时能达到团结,也立基于社群之中。■

> 后疫情时代下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

Stephanie Ross, McMaster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 劳工运动 (RC44) 研究委员会成员。以及 Larry Savage, Brock University, 加拿大



2022年2月，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阿卡迪亚大学的教师协会举行罢工。
来源：Can Mutlu。

大多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能注意到现今的三大趋势。第一，教学内容趋于市场化；第二，高等教育的工作内容、组织、人员分发和工作报酬都呈现戏剧性的改变；第三，在上述两个相关的要素影响下，将持续推动高等教育中形成组织和斗争的浪潮。而这是种不平衡的阻力，且与应对、同意或退出等个人策略交织在一起。新冠肺炎的疫情使上述的状况变得更加严峻，并从中产生了疑问：后疫情时代下的高等教育现况为何？而谁是其中的得势者？

> 新自由主义作为高等教育下的产物

在过去30年，高等教育逐渐呈现新自由主义化，使教学内容也随之市场化。为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生存，高等教育必须服膺于研究和劳动市场的需求。高等教育机构也屈服于市场法则，争夺学生、学费、随着学生而来的政府补助，和那些用财力影响学校方针的私人捐助者所提供的投资或慈善项目。多数「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研究者指出，内部决策规范和流程开始发生转变。公

>>

司式结构将权力集中在高级行政部门，取代了以教职员和其他部门为主的学院治理。这种市场导向还控制了预算，并透过绩效指标来构建内外部资源竞争。这些转变在教育项目中也很明显，现在必须吸引学生去考取在劳动力市场中有价值的证书，还必须向他们证明这些证书跟他们工作相关；而不是去发展他们的批判技能和观点。

> 劳动改革：新自由主义劳动体制的实践

工作重组是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需要新的学术劳动过程和权力关系来实现这项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愿景。具体而言，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过程受到工作流程的碎片化影响，将学术劳动力区分成教学、研究和一般服务等不同单位。同时，这也降低了对部分的人员的技能要求，并使他们替代性高的劳力越来越廉价。在高等教育中，以定期合约聘雇的教授和研究者越来越多。在这类短期聘约的教职员鲜少参与学院治理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不只可以节省预算，更能够巩固上层在行政上的控制。在工作劳动的强化伴随着碎片化的现象下，求职者对稀少的「好工作」以及短期聘约的竞争也同时加剧。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情绪劳动。学生们对教育的想像也受到大学新自由主义化下的影响，这也让校方必须想办法达到这些期待。最后，我们看到了在教师产能成为主要评量指标后，发展出的上层问责制和底层监视制度；个人履历成了学术上的计时器，以用来约束自己往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方向迈进。

> 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原封不动或除旧布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强了这三个趋势：商品化和集权化、劳动改革与工作强度上升、抗争和冲突。疫情爆发的急迫性让学校上层能够进一步的集中决策，并在规避学院本身情况下做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针对是否恢复实体教学以及何时公布确切的返校时间，还有后续工作上的健康保护措施等问题是最快引起冲突的部分。此外，教职员对上层决策重返工作岗位上的动机存有担忧。换言之，上层的决定是优先考量市佔率和预算，而非教职员的安全。这些缺乏正面影响的决策导致众人的不信任、愤怒、怨恨和低下的配合意愿。

疫情也导致工作强度显着地上升。教师们必须快速适应紧急的线上教学和相关操作，并学习新的科技。除此之外，许多学生线上学习的同时还要面对确诊、死亡、失业和对未来的迷茫等。这时教师也被赋予期望，展现大量的情绪劳动陪伴同学度过困境。教师必须在压抑自己恐惧的同时承担学生们的感受。有些教师在家中工作的情况是，同时还要照顾到在家中也是在进行远距上课的孩子。这些工作是建立在研究产出的要求并未减少的状况下，这使得在原先已经高度分层的结构上就已佔有优势的特权教职员更居上风。

新冠肺炎带来的劳累加上教师对行政上的不满情绪，以及为了恢复财务而采取的紧缩措施，正导致一种集体抵抗。虽然在疫情初期高等教育的罢工率急剧下降，但我们可以现在看到校园内频繁的各式斗争和劳动力中断的现象有所增加。最显着的便是，2022年初期席卷加拿大和英国的高等教育教职员罢工；虽然严峻的疫情让结社变得困难，但这些高等教育工作者仍在与学校高层疏离的情况下创造出空间，支持彼此。

罢工是否能改变后疫情时代下主张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仍是个未知数。但我们知道的是，外界政策和经济压力会持续影响学校高层做出改革及决策，而这将激起学术界工作者的愤怒，甚至使抗争行为变得激进。■

來信寄至：

Stephanie Ross <rosss10@mcmaster.ca>

Larry Savage <lsavage@brocku.ca>

> 高等教育与就业： 东亚趋势¹

Ka Ho Mok, Lingnan University, 香港



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导致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并形塑劳动市场的竞争焦点。
来源:岭南大学。

近几年,因高等教育大众化下的毕业生开始求职,东亚面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工市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无疑造成这些社会新鲜人的压力,因此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表一显示了东亚地区2020年不同教育程度的失业率(已筛选国家、地区)。虽然因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关系,无法直接看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失业率提升之间的关系,但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近期的毕业生因教育大众化的关系,无法顺利取得抢手的职位。这引起了关于入职工作品质的问题,包含他们是否在正规的劳工市场。

>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毕业生就业之挑战

因为全球化的扩张以及知识经济领域的改革,许多新兴国家为了增加国际上的竞争力而推广高等教育;预料之外的是,这些毕业生们仍旧无法在劳动市场上展现出自身的竞争力。虽然全

球失业率逐渐下降,仍有超过一兆七千万人处于待业状态(国际劳工组织,2019)。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二十一世纪以来,青年的就业人口便呈下降的趋势。相较于欧洲、北美和非洲地区,亚洲国家尤其东亚地区的青年就业率下跌状况最为显着(图一)。东亚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下,青年的失业率更是呈波动的上升趋势。

近期的研究不断表示,东亚和西方的新一代高等教育毕业生会面临更大的求职困境,被迫面对职缺不足和失业的可能。图二为东亚青年失业人口的趋势。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可能为了取得工作而从事学历要求较低的职位,造成市场上「大材小用」的问题。这些现象可能导致高失业率、低薪和低工作保障等状况。高学历劳工供过于求的现象不只揭露了人力资本理论中「倾注资源在教育上能增加社会流动」的错误,更把新一代高教育程度劳工无法取得相对应职位的

>>

2020年东亚地区的失业率
按教育程度分类 (部分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教育程度	失业率 (%)
香港	中学后教育	5.10
日本	大专及大学	2.90
韩国	大学及以上	3.50
台湾	大学及研究生院	4.92

表1. 来源: 香港,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62020AN20B0100.pdf>; 日本, <https://news.yahoo.co.jp/byline/fuwarai/20210325-00228342/>; 韩国统计资讯网, <https://kosis.kr/eng/search/searchList.do>; 中华民国(台湾)统计资讯网普查统计, <https://eng.stat.gov.tw/ct.asp?xItem=42761&ctNode=1609&mp=5>°

青年就业与人口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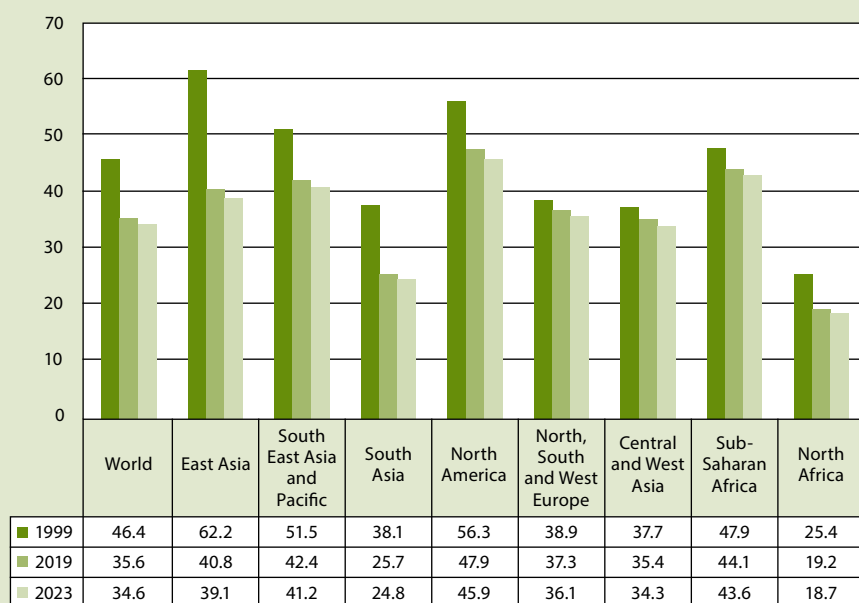


图1. 来源: 世界银行。
<http://datacatalog.worldbank.org>°

东亚青年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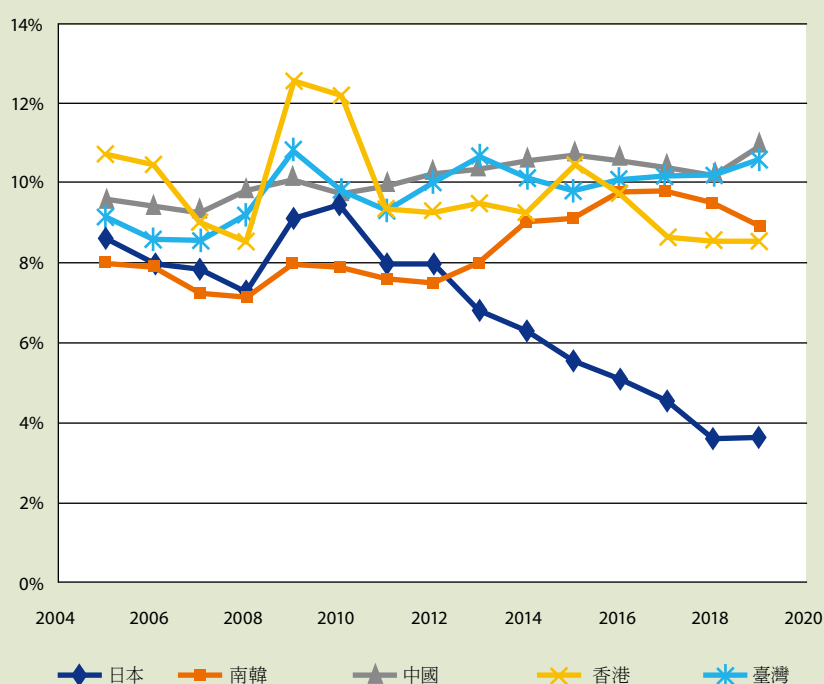


图2. 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香港政府统计处, <http://www.censtatd.gov.hk/sc>; 中华民国(台湾)统计资讯网, <http://www.stat.gov.tw>; 韩国国家统计局, <http://kostat.go.kr>; 日本统计局, <http://www.stat.go.jp>°

现实摆在大家眼前；年轻劳工针对工作不稳定的不满日益渐增。

以日本、南韩、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为例，大学学历劳工的失业率在2004年到2020年间起伏不定（见图二）。失业率没有稳定下降的现象，表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无法解决东亚地区年轻人口的就业问题，代表这些社会新鲜人即使取得较好的学历也无法帮助他们顺利求职。日本在降低年轻人口失业率的方面表现得比较好，虽然2018年后有些回弹；因此，高学历如何帮助取得一个较体面的工作是东亚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 政策影响

本文阐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如何带给毕业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大学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符的状况。现今的研究发现了高等教育阶段的知识习得与劳工市场需求接轨的重要性，但目前教育内容和市场要求技能呈现断裂的状况，有些供应方甚至认为学生们在市场领域的技能培育应该由校方处理。然而完善且优良的职场训练并不与学生们未来的表现直接相关，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谨慎的审视其课纲，协助学生面对未来瞬息万变的社经脉动。

青年失业与低度就业的现象愈趋严峻，再加上人力资本理论不符现实的状况，让年轻世代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研究也显示近几年东亚的年轻人时常形容自己是不快乐的；在英国及欧洲等地年轻人外显的负面情绪也迫使政府正视「新世代危机」。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应该用严谨的态度面对这代社会新鲜人之间加剧的冲突，尤其是当已经有越来越多不悦的年轻人视教育、工作、居住与福利等世代不平等为这些问题的源头时。■

來信寄至：

Ka Ho Mok

<kahomok@ln.edu.hk>

1. 该论文是作者近期论文的修订和改编版本。Mok, KH, Ke, GG and Tian, Z (2022) 「Massification and privat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raduate employment from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见 Brown, P 等人编辑之 *International Handbook for Graduate Employ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出版。

> 在巴西民粹主义下的大学韧性

Elizabeth Balbachevsky,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黏贴于墙上的「民粹主义」字样。
来源：[flickr](https://www.flickr.com/photos/1481111111/1481111111/)。

本文着重于公立大学如何面对民粹主义政府的挑战，并借由探究巴西公立大学面对 Bolsonaro 政府的当代经验来实现这一目标。

过去数十年来，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面临了许多治理方面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管理化和其他各种不同面向的挑战形塑了高等教育、政府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本文更必须进一步的指出新民粹主义政府的经验：在这类的政府底下，大学不仅仅面对要求改革的敌对政策环境，更须面对政府比起政策转型，更试图击溃大学等这样具有敌意的环境。

民粹主义在政治分析上已经是个老术语，说明领袖如何借着操控来自众多人民的支持晋身或恋栈权力核心，其借由精密设计的不同话语来编排社会上的各种不满与委屈情绪以实现动员。目前，在知识份子所忽视的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如雨后春笋般湧现，为政治企业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透过投入时间和资源来表达并组织这种不满的情绪。利用旧有的民粹主义

工具：培育领袖与支持者间的个人纽带，和承诺会涵盖与保护这些「长期被忽视的人民」。

> 新民粹主义者对大学的攻击

在这种话语中，大学和其他实体，代表着敌人：其被视为后唯物主义文化和价值的摇篮，挑战了「人民」作为核心的信念。大学更体现了科学与科技，并威胁旧有的传统。原有这种保持怀疑态度来建立事实的方法，却是另一个质疑的来源，这些臆测使得大学成为另一个要被打倒的敌人。在新民粹主义更加集权的版本中，控制大学生活的政策具有更深的意义：它们的目的是要把大学变成传播新民粹主义政权所支持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

新民粹主义威胁着今日的巴西民主，然其根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贫穷与不安全感，更进一步来说：其加剧了品质不稳定的教育以及普遍缺乏现代技术和能力培训所带来的不安全感。2018年赢得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Jair Messias Bolsonaro更助长了这样的忿恨，其操控不同的

>>

社群平台及制造多样的叙事以针对他的支持者，每一种论述皆利用仇恨、愤怒，并将候选人视为所有不满的正义表态，以及维系旧有传统价值观的斗士。

只要在总统办公室，Bolsonaro 就可以借由社群媒体动员起庞大、发散和多样化的追随者网路的支持，以及大量来自不同党派国会议员的热情后援。在保守的政策底下，动员对Bolsonaro的政治支持，其主要目的是拆除所有领域的限制框架：如环境、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福利等。

Bolsonaro 政府亦视公立大学为敌。在不同的场合中，政府成员曾描述公立大学为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巢穴，并指责大学当局容忍在校园内种植大麻。因此，政府针对联邦大学预算严厉地进行删减。法务部亦动用了1960年代的威权时期旧法，每在当学者和大学高级行政人员胆敢在公开谈话中批评政府时，就对他们发起法律诉讼。政府还以疫情为借口，冻结了新学者和雇员的招聘。另外，政府有两个在不同场合干预大学自主的行为：缩编支持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资源，并采取行动干预以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为重点的研究所课程延续。最后，在许多方面上，政府试图扰乱大学自治，绕过法规并指派小型保守运动的领袖为大学高层。

> 来自大学的抵抗

尽管面对这样的困境，巴西大学仍旧存活了下来。能亲眼目睹疫情所带来的挑战，并能获取资源创新教学、学习新的教学工具应用于远距教学之中，与发表应用程序使经济弱势的学生得以使用网路。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和教学部门，透过理解疫情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持续改善自身，矫正了当今巴西社会对于大学的观感。

大学的抵抗来自几个未竟的志业，首先特别是在媒体和司法上作为巴西社会的坚实后盾，其来自公立大学为1970和1980年代国家民主化奋斗以来所扮演的重要位置。其次是同侪评量在科学与研究所教育政策中的角色，当面临胁迫时，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将团结起来支持学术自由。最后，合议制仍然是在巴西进行大学自治的根基，合议制意味着大学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过程与许多享有半自治的决策中心重叠。院、系、实验室、研究所、计划都在内部决策过程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当政府的不当领导导致行政中心垮台时，这些中心则透过建立临时联系，引领大学走出困境。因此，巴西经验显示，为了面对由新民粹主义威权政府带来的风暴，旧有的治理模式仍存存续于大学的抵抗之中。■

來信寄至：

Elizabeth Balbachevsky

<balbasky@usp.br>

> 一所乌邦图大学的可能性

Yusef Waghid ·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 南非

本文将透过强调人性尊严与相互依赖性的非洲乌邦图(ubuntu)的伦理概念,重新检视大学的内涵。全球的大学已经发展成关注知识生产(再生产)的机构,目的上从个体自治、社会责任到为经济与市场的利益服务上皆有涉略。然而,我最担忧的是大学并没有完全负起对社会该有的责任。

> 危机下的社区大学

尽管宣称南非的公立大学有进行过全面改革,但仍以消极的态度,不愿意解决诸如学生抗议学费不断提高的问题、学院内的贪污腐败及资源的不当管理、性别不平等与排挤、性骚扰、成绩贿赂、抄袭和纪律涣散、学生过量饮酒及偏差行为增加等问题。然而,最令人担心的仍是大学的高等教育本身,目前的教学内容过度着重在既有知识的传递,而批判性教学的内容却相当有限。疫情爆发后,随即出现的远距教学似乎使批判性教育又再次为了线上教学及混合学习法牺牲,好似这些针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手段能增加众人对大学教育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所背负的公共责任似乎就受到了威胁,以摇摇欲坠形容大学机构现在的状况也并非危言耸听。

为了回应目前南非国内大学众所皆知的严峻状况,我认为校方应该重新思考非洲的乌邦图智慧。在我的观点中,无论是哲学或政治道德方面,乌邦图皆可以回应目前的大学状况。第一,乌邦图面对目前大学面临的困境,可以提供不一样的思考模式;第二,重新订定一个具教育和改革性的学校方针,融入群体的概念,培育学生掌握个体自由、团体活动和归属感之间的关系;乌邦图的框架可以引发高等教育机构重新思考自身的改革潜力。

乌邦图的独到之处在于其与个人行为的内在连结,和与他人、环境以及电脑或其他科技产

品等非人之存在的外在关系展现。如俗谚「我在因我们同在」(I am because we are)强调,乌邦图意旨自我与他者之间深层和互相的关系;受到乌邦图启发的行为着重在与他人共事,而非总是为他人做事;我认为带有乌邦图理念的大学可以主动做出带有社会责任的行为。基本上,这样的学校不只能够推动改革计划,更能扩大自身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涉及理性和知识主张,和过去未被探究过的路线上的转变问题。其次,这种学校会注意教育机构本身和外界社群之间的互动,并非将参与广泛社群的行为视为服务的提供或发挥影响力的场域,而是符合机构和更广泛公众的利益进行合作。最后,学校宣称将培养对当地和全球问题的道德关怀,能够提升人性尊严、社会现状,强化修复式正义和创造一个共享的和平世界。

> 去殖民化与乌邦图型态大学

对于社区大学而言,高等教育改革中最棘手且更应该积极看待的面向是,去殖民化的概念。当谈论高等教育的去殖民化时,通常是指一种抵抗的实践,这种实践目的在于解开对高等教育实践权力共享的误解。在经历去殖民化后,文化价值、经济远景和受殖民社群先前的知识兴趣都有望在去殖民化的概念下重建。这也意味着,公立大学内的去殖民化能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毒,和找回过去被贬低且边缘的文化智慧。如此一来,去殖民化的高等教育更可以为过去受排斥社群的基本价值体系重新发声,这便是去殖民化与乌邦图连结所在。在某种意义上,乌邦图连结也同样认为他者的价值需要受到关注。因此,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透过乌邦图概念进行的教育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时可能会被问到:乌邦图型态的大学与创业型大学、思辨型大学和生态型大学有什么差别?虽然上述类型的学校都强调认识论和自身与

>>

「乌班图的概念，可以促使高等教育机构重新考量自身的改革潜力。」

周遭族群之间的道德关系，但我认为只有强调尊严和人性等情绪主义的乌邦图概念大学能够强化一所学校的自主性、责任感和思辨能力。

一个乌邦图型态的大学有哪些关键要素呢？首先，「我在故我们在」中的「我在」凸显出大学所提倡的自主性。拥护个体自主性是大学被创建的初衷与价值所在——正好呼应了格言中的「我在」。

第二，句中的「我们在」在乌邦图的概念中与追求集体行动的概念有关，但乌邦图所认可的集体性是建立在审议的行为之上，重点是必须透过参与者来提升审议式会议的素质；这样的审议形式同时具有教育性和政治性。审议的实践在高等教育中的成败，取决于参与者是否能够在大学内外主动提出批判。高等教育的意义在于，让人们以开放、充满反思性和连带的精神一起工作和行动，共同探索事物的内在和外价值。另一个重点是，乌邦图型态的大学不能仅仅为了追求自我成长而进行高等教育，因为这样就等于否认了大学对于公共、社会、全球的责任。

第三，乌邦图型态的大学应该要有远见，并且同时关注地方与全球的脉动。在这里争论我们对非洲大学的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受 ubuntu 启发的大学仍在成形当中。这样的学校应当在关注地方和社会的学术研究之余，还要去了解全球问题，探索共存的可能性并听见多元化的声音，并且与他人产生信赖关系以实现和平合作和进步。就是这样一所乌邦图大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是处理国际议题和反乌托邦问题。

最后，我们应该把乌邦图的格言「我在故我们在」(I am therefore we are)改为「我在故我们在且能够成为」(I am therefore we are and can become)。这意味着一所乌邦图型态的大学应该永远都在蜕变，面对可能性不轻易断言，而是以开放的态度面对。■

來信寄至：

Yusef Waghid

<yw@sun.ac.za>

> 真实乌托邦的必要性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Erik Olin Wright 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他在马克思基本阶级间的中介关系的研究，也就是阶级位置的矛盾，已经转变成全球性的计划，并启发横跨全球的阶级分析。其与阶级的逻辑基础与经验关系持续搏斗至其人生谢幕之时，于在其重量级著作《阶级》(1985)、《阶级很重要》(1997)和最后的反思《理解阶级：二十一世纪阶级论》(2015)中可见一斑。一般人总会自满足于完成一件重要的全球计划，但自1990年代初，Wright 开始了第二轮全球计划——即真实乌托邦计划。这是货真价实存在的苏联与其卫星国之社会主义垮台、中国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得到巩固的年代。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底下，许多人声称马克思主义已死。然而，Wright反对这样的观点。他预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与中国党国体系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其抱持着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成长的，或是从资本主义对于劳动依赖下生产的，建立在实际存在的制度中的愿景。在他的专著《真实乌托邦》(2010)中为真实乌托邦构建一缜密的理论架构，和晚近呈现其理想宣言的《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2019)，在他死后翻译成多达13种语言。

但Wright不仅仅是真实乌托邦的理论家，更是个真实乌托邦的实践者，探访世界各地追寻可能会挑战资本主义的任何地方，并与试图实践自身承诺的社运人士展开对话。他不但启发了学术界，更扩及为社会正义奋斗的群众。在和这些真实乌托邦的领导者们对话时，Wright能找出它们的基本原则、内在矛盾以及其存续与传播的条件。他自己不但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系所开课，也在世界的最遥远的角落谈论真实乌托邦的可能性与限制，而这些课程则在由Verso出版的系列书籍中结束。

在所有其促成的改变中，Erik Wright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未竟之业，即把真实乌托邦们做为

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计划团结起来。于《真实乌托邦》中，Wright列下了真实乌托邦试图去消融的资本主义毁灭性特质，并宣称其根源必来自公民社会之中。他更谋求重建社会主义社会，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中，他将真实乌托邦建立在其所拥护的价值观中——平等、民主、社会正义和连带——这些价值观已被运用到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但在资本主义下只能部分实现。尽管如此，关于真实乌托邦背后的驱力以及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仍然存在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建议从Karl Polanyi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44)中找到对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正如我将要论证的，Polanyi的想法本身是有限的。他们需要被灌输一剂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动态的理论。当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Wright的概念从想像乌托邦转向真实乌托邦时，这个循环就完成了。

> 追寻真实乌托邦的团结

Wright的《真实乌托邦》架构非常简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诊断)、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解决方案)、转换问题(治疗)。Wright对资本主义有11个批判，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延续了人类不必要的苦难、阻碍人类繁荣发展的条件、限制个人自由、违反平等主义原则、在关键方面效率低落、偏向消费主义、破坏环境、威胁到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助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腐蚀社区、并限制民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控诉！这些因素彼此紧密相连，但它们没有提供任何统一的主题或核心批判。

如果存在统一性，则不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在解决方案，即赋予公民社会相对于经济和国家的权力，进而在社会主义中重建社会。他摒弃了困扰社会主义历史的想像乌托邦的想法，着手发现「真实乌托邦」：实际上存在着具有反资本主义特征的形式——机构、组织——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成长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与之共生。

>>

「谁将形成集体行动者，把人类从资本主义中拯救出来？这是马克思、波兰尼和 Wright 留给我们的问题。」

他最喜欢的一些真实乌托邦是：基本收入补助金、合作社、维基百科、参与式预算、社会经济。他的计划是与实践者合作，抽象地制定真实乌托邦，审视它的存在和传播条件以及它的内在矛盾。真实乌托邦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挑战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或多个破坏性特征。Wright 制定了一系列转型策略——共生、裂隙、退出和破裂——但对这种转型的推动者却相当沉默。同样重要的是，他未能将这些真实乌托邦与资本主义动态理论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可以解释它们的出现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挑战。而我将透过 Karl Polanyi 和马克思来拯救 Wright 的计划。

> 从 Wright 到 Polanyi

Polanyi 也迷恋真实乌托邦——Robert Owen 的公社主义、合作社的发展以及行会社会主义的雏形。他们都融入了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运动中，反对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商品化。正如我们所见，Wright 的真实乌托邦也可被视为对商品化的反动，但尚未确认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Polanyi 将法西斯主义、史达林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视为国家主导对不受管控的市场化之反应。然市场基本教义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主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有趣的线索在著名的波兰尼悖论——他没预料到从 1970 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即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我称之为第三波市场化——因为 Polanyi 自己的历史记载包含的不是一波而是两波——一波在 19 世纪主要集中在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反应，另一波在 20 世纪由货币商品化（金融首都），前者导致社会运动的反应，后者导致国家的反应——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病态的，而 Polanyi 特别警惕法西斯的反应。

Polanyi 认为人类再也不敢尝试市场基本教义主义了，人永远不再冒险破坏不受管控的市场，创造出他所谓的「虚构商品」——劳动力、货币和自然——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不受监管的交易中被破坏。但他错了。从 1970 年代开始，还有另一轮市场化，那为什么他对这种可能性视

而不见？我相信，答案是他对市场基本教义主义有其理想在——一个危险的乌托邦，来自被误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脑袋。

Polanyi 的理想主义还表现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敌意上——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的敌意。就 Polanyi 看来，马克思高估了由剥削驱使阶级斗争的可能性。的确，马克思的叙述中存在一个悖论：当剥削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神秘的，当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扩张有物质利益时，怎么会有阶级斗争呢？

Polanyi 没有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奋斗，而是认为透过商品化的视角而不是通过生产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对马克思而言，商品化有助于使生产剥削神秘化，而对 Polanyi 而言，商品化的破坏性，尤其是「虚构商品」的破坏性，会造成剥夺和不满。但是，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关注以剥削为代价的商品化，以牺牲生产为代价的市场，Polanyi 没有资本主义动力理论，即（去）积累理论。因此，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扩张中他看不到市场化的根源，而这就让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

> 从 Polanyi 回到马克思

商品化不是由容易犯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附带特征。相反，这是资本主义设法解决其生产过剩和利润率系统性危机的方式。生产过剩被寻找新市场所抵消，这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初期，而且贯穿整个资本主义，而且，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涉及到大量的暴力。我们可以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对殖民地廉价劳动力的原材料提取，从而创造了新的消费市场。换句话说，正是透过市场化浪潮——商品化的扩张——资本主义克服了它所产生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商品化的运动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反商品化可以是反资本主义的。因此，如果我们透过反复出现的商品化浪潮来体验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那么商品化就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战略的舞台。

马克思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动态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确实使不断深化的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条件。然而，马克思只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视为来自生产斗争，他没有将市场化本身、一切商品化视为集体抗争的更强大来源。如果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下市场化浪潮必然性的唯物主义理论，那么 Polanyi 则为我们提供了市场化所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抵抗理论。

有了 Polanyi 和马克思的基础，我们现在可以回到 Wright 了。我们可以将他真实乌托邦视为反商品化计划。基本收入补助挑战劳动力的商品化，参与式预算和公共银行挑战资本的商品化，维基百科反对知识的商品化，农村合作社威胁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我认为反商品化是其另类真实乌托邦的一个统一框架。它们成为 Polanyi 所谓的反对运动的一部分。

> 关于能动性的问题

马克思拒绝用制度性内容充实共产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而允许任何政权或任何运动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Wright 对他的真实乌托邦提出了重要的校正，惟其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Polanyi 对商品化的批判提供了这种统一性，但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动态与连续不断的市场化浪潮之间的关联。即使马克思低估了商品化的破坏性，他还是透过将积累与市场化串接起来为其提供了最后的黏着剂，但这种理论综合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

首先，正如 Polanyi 指出的那样，反商品化，即所谓的反对运动，最终可能会滋生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从而牺牲 Wright 乌托邦的民主特性。何者可以保证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

其次，Polanyi 认为，当商品化威胁到社会时，社会应当会做出反击。我们不能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担心反对运动的形式——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同时还要担心反对运动是否可行。

第三，当反商品化成为「去商品化」的一种形式时，它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吸收策略。因此，建立福利国家可以引起对资本主义的苟同，而不是取代它。什么情况下反商品化能变成反资本主义？

第四，市场化可能比商品化走得更远，它可能把虚构的商品、生产要素从市场上完全驱逐出去，也就是废物的产生，我称之为「前商品化」。商品化会导致劳动力、土地、金钱、知识和环境的破坏。过去五十年的第三波市场化尤其如此。

第五，今天的挑战是将反对运动扩大到全球层

次，在没有解决全球商品化框架的情况下，反对运动仍然存在于地方和国家层面。当我们处于第三波市场化之中时，我们居然仍热衷于应对第二波市场化。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引发了令人烦恼的施为问题：谁将组成集体行动者，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拯救出来？这是马克思、Polanyi、Wright 留给我们解决的问题。■

來信寄至：

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 土耳其社会学： 挑战与可能性

N. Beril Özer Teki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ESA 健康与医学社会学研究网路成员(RN16)

土耳其的社会学非常活跃，有一些独特的议题和讨论领域。公民社会、政治、政策、环境问题、日常生活和消费是讨论最多的议题。疫情影响的层面，除了土耳其与其他国家在独特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动态和制度特征上的差异之外，也影响了做社会学(doing sociology)的实践。在各个社会阶层所经历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疫情，以及从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下，为目前正研究的课题带来疫情的视角，也让不平等的议题得到了更大的关注。

这一章节的文章，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土耳其的社会实在和社会学实践。

Aslı Telseren 在「土耳其的性别平等／不平等与女性主义」中，讨论了从过去到现在的女性主义运动。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她还指出了当前的挑战，解释疫情如何扩大性别差距，并增加性别暴力和杀害女性(femicide)的行为。这篇文章也指出，疫情显示了女性劳动的重要性——包括有偿和无偿劳动。

Dicle Koylan 在「土耳其的新冠病毒与中产阶级消费之情况」中，讨论了疫情之下白领劳动者的新工作模式。文章主要关注于居家办公为工作氛围和习惯所带来的改变。管理阶层期盼更长的工作时间，却无形地增加员工身上的压力，同时改变其消费习惯。

在「土耳其的环境主义社会学」中，Özkan Öztürk 探讨了土耳其这个国家对环境问题产生社会反应的历史过程。他指出，目前作为土耳其主要政党的正义与发展党透过相关政策的设立，如水力发电厂等能源政策，进一步向大众推广环境议题。再加上网路的影响，环保主义论述能与更广泛的受众产生共鸣。

İlknur Hacısoftaoğlu 在「捲入土耳其意识形态冲突的女性」一文中，讨论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而她关注的是体育场域中的性别和身体建构。文章的最后强调，虽然女性的身体持续在政治辩论中被作为工具利用，但女性仍会为自己的命运抗争。

在「土耳其的疫情和『数位移民』」中，N. Beril Özer Tekin 探讨了疫情期间日趋严重的年龄歧视，并指出网路和智能数位技术能为老年人(即所谓的「数位移民」)带来的可能性。她表示，土耳其可以通过网路减少排斥、社会孤立和不平等的现象，同时对此提出建言。

希望你能喜欢这个章节! ■

來信寄至：

N. Beril Özer Tekin

<btekin@dogus.edu.tr>

> 土耳其的性别平等／ 不平等与女性主义

Aslı Telseren, Doğuş University, 土耳其, 以及社会与政治变革实验室——巴黎西岱大学女性主义研究教学、文献和研究中心(LCSP-CEDREF)



3月8日在土耳其的游行。在疫情之下，将女性主义的诉求带到街头变得更加重要。

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指的是社会角色之间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性别体制透过以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政治需求为依据的社会制度建构，决定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和阶级。因此，可以知道不平等既不是自然形成，也不是生物预设，而是由社会建构而成。

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指的是不分性别皆平等拥有取得公共、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机会。社会学家 Nilay Çabuk Kaya 将性别平等定义为，男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¹。在这个脉络下，性别平等将扩大到所有的个体，无论是顺性别或跨性别的女性和男性；成人或儿童；就业或失业的人等。因此，性别平等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平等代表，更与女性运动和多元性别运动密切相关。在土耳其的特定情形和社会结构中，实现性别平等需要根除所有会危及妇女和多元性别个人的行为，包括针对身体、心

理、经济上的危害，以及性暴力、杀害女性的现象(femicide)、工资差距，和基于性别的歧视。本文将讨论截至 2021 年底土耳其的性别平等／不平等现状。

> 土耳其的性别平等／不平等简史

关于性别平等／不平等(这里主要是针对生理性别上的平等)的讨论，可以追溯到鄂图曼帝国的现代化时期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正如 Serpil Sancar 和 Ayça Bulut 所讨论的那样，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共和改革将女性描绘成现代化的象征和土耳其社会的现代面孔²。因此，性别平等政策是作为现代化或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所制定，而不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特征。尽管这一时期将家庭从优视为一种结构，但也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包括选举权和民法典。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但社会当中的性别平等远远未能实现，性别不对称仍然存在。

自1980年代末以来，女性组织和女性运动在推动性别平等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卓越的政治努力和在塑造政治和社会格局上的参与度都越来越明显。在1990年代，由于女性主义的努力，女性首次获得了法律和社会福利。为实现女性人权，例如接触公共、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平等机会；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增加女性的政治代表权，女性主义的抗争将会持续下去。此时期，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现存的父权结构。他们还关注性别歧视、男性主导地位、家庭暴力和无偿家务劳动等问题。他们着重在分析父权的作用以及父权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由于其努力，大众对于因性别

>>

不平等所产生的既有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机制,都有了更多认识。

> 当代的挑战

由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女性主义者的努力,女性运动在社会和政治上变得更加稳健。在2000年代及之后,似乎所有将父权和其社会结构视为问题的女性,不论其宗教、族群、阶级、性取向或年龄为何,都成为了女性运动的主角。正如 Hill-Collins (1990)所说,性别、阶级和族群是现代世界上最模糊的政治化社会关系之一。在明白阶级、性取向、年龄、宗教、健康状况、公民身份将区分出不同的女性经验后,女性主义者持续探究权力关系与女性的社会和政治经验之间的交互关系。土耳其女性运动的交织性可以说是让社会运动茁壮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回顾 2000 年代的政策制定过程时,可以明显看到这段性别政治与1999年赫尔辛基高峰会后加入欧盟的过程是一致的。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土耳其在女性权益进展上的许多迹象。包括:修订土耳其法典和民法典,以及主持《伊斯坦堡公约》。土耳其成为第一个签署《伊斯坦堡公约》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确保地区中的女性无论性取向为何,都不会遭受暴力以及防止家暴的欧洲公约。这份文件可以作为一种对多元性别个体的保障。在批准该公约后,土耳其于2012年通过了对应的第 6284 号法条。

然而,随着2012年后的去欧洲化政策,这些改革逐渐停了下来。这段时期恰逢从平等主义论述转向保守主义论述的趋势。这时候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强调着家庭的重要性的和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这种论述也成为了重新巩固父权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2021年,土耳其成为了第一个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国家;他们甚至是在没有得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直接退出。

尽管过去几十年土耳其在性别平等上有所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挑战。包括女性在政治和劳动力中的代表性不足、女性的高失业率、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杀害女性的现象等。此外,疫情也对性别平等产生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增加。由于限制行动的封城政策,使得许多女性被迫待在不安全的环境下,难以对外求援。

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带有传统、刻板印象的分工仍然普遍,照护工作仍大多由女性承担,而男性则负责家计。尽管在性别实践上可以看见重大的进展,但疫情也同时扩大性别差距,不合理地增加女性身上的重担。尽管最近的研究显示³,男性在疫情期间花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在家务上,但男性在家务劳动上的参与并没有减轻女性的负担。事实上,这场疫情揭露了女性劳动的重要性。正如 Melda Yaman⁴指出,虽然疫情使得外出生活全然停摆,但女性仍以有偿和无偿的身份继续工作、进行再生产劳动,照顾家中儿童和老年人。以经济层面来说,她们受新冠肺炎的打击更大,因为她们身在不安全的劳动市场与工作环境中。这些因素都使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空间变得弱势,成为实现性别平等路上的一大阻碍。■

来信寄至:

Aslı Telseren

<telserena@dogus.edu.tr>

1. BBC土耳其新闻,〈什么是性别平等,为什么在土耳其会引起争议?〉
<https://www.bbc.com/turkce/haberler-turkiye-49679143> (2022 年 5 月 17 日,采访于土耳其)。

2. Sancar, S. and Bulut, A. (2006) ,〈Turkey: Country Gender Profile, Final Report〉
https://www.jica.go.jp/english/our_work/thematic_issues/gender/background/pdf/e06tur.pdf (取用日期:2022年5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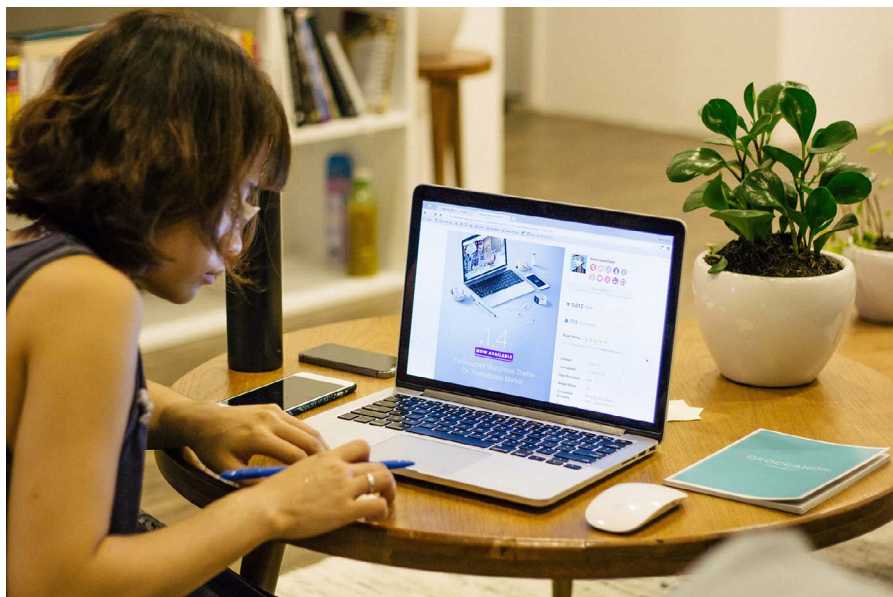
3. 可以参阅 İlkcaracan, İ. 以及 Memiş, E. (2021)《Transformations in the gender gaps in paid and unpaid wor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indings from Turkey》,女性主义经济学,27 (1-2), 288-309,
<https://doi.org/10.1080/13545701.2020.1849764>, Hızıroğlu-Aygün, A., Köksal, S. 以及 Uysal, G. (2021)《Covid-19 pandemisinde toplumsal cinsiyet eşitsizliği: ev işlerini kim yaptı? Çocuklara kim baktı?》伊斯坦堡政策中心, Sabancı Üniversitesi. <https://ipc.sabanciuniv.edu/Content/Images/CKEditorImages/20210401-19040880.pdf> (土耳其文)。

4. Yaman, M. (2021年3月7日)〈Pandeminin içinden: kadınların yeniden üretim emeği〉Birgün, <https://www.birgun.net/haber/pandeminin-icinden-kadınların-yeniden-uretim-emeği-336621> (土耳其文)。

> 土耳其的疫情与中产阶级消费

Dicle Koyla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来源: Tran Mau Tri Tam, 创用CC。



疫情短时间内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机构与日常生活，世界各国政府对于社交生活的限制也使得社交距离与社会隔离的概念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从做生意到休闲活动，我们生活中需要与人相聚的社交活动都被重新规划，而这也意味着日常生活模式、消费习惯的改变。

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在中产白领阶级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在疫情前过着规律通勤上下班、在尖峰时段中塞车、面对面举办会议、在办公室固定时数工作与经常进入公共区域的生活。疫情的爆发无疑转变了社会的各个环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最大的莫过于开启居家工作生活的白领阶级。大公司和组织在技术数位化上的努力造就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得以可能，在疫情期间能在家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奢侈。这是中产、上层白领阶级所拥有的选择，而下层阶级则无可选择。

在疫情期间的土耳其，蓝领阶级与医护人员被认为是容易受到影响和伤害的群体。许多低技术劳动者只领有低廉的薪资，甚至是只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例如货运司机、肉类产业工人、超市收银员和建筑工人，他们面临的感染风险都很高。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条件并不弹性，也不适合技术数位化，更不能在家工作；因此此次的疫情并未全然变化了他们的工作模式。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交、日常生活、消费习惯，还有许多与人们的互动，像是在咖啡厅的聚会以及参与热闹的婚礼等等，当然同样也受到影响。我们要记得资本社会的核心是倚靠人们持续的工作，所以下层阶级的工作必不能有停断，且尽可能要与过往相同。

> 对于白领阶级的巨大影响

相较于在疫情中习惯奢侈的上层阶级与富裕菁英阶级，下层与中产阶级独自目睹了这些负

>>

面的冲击。我强调的是这些中产阶级，特别是白领工人他们在疫情间并未失业但承受的痛苦却未比其他人更少，只是他们所承受的困难并没有被正视，甚至被忽略了。他们目击工作技术数位化的困境，在工作条件与公司对于工作资格要求上的改变，也已影响了他们整个生活。

白领工作者通常会在办公室上班以及参与面对面的会议，在过去的工作环境会面对到很多人际上的互动。然而疫情迅速地转换这一切，所有生活中那些要面对面的人际互动都被禁止或限制了，当然也包含他们的工作。因此，白领工作者被限制在家并且尝试习惯在家工作的生活时，他们建立了新的日常模式，也造成消费习惯大规模的转变。

疫情带来社交孤立的处境，人们多被限制在家而他们的消费可想而知也被限缩。禁闭、限制和封城降低了人们在公共空间现身的频率。这意味着奢侈和炫耀性消费（花费金钱购买奢侈品与特殊服务，以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经济能力）也减少了。人们不购买昂贵的衣服、高跟鞋、奢华的香水或化妆品除非他们要外出。假设他们没有外出到公共领域，如：购物街或是购物中心的工作室，那么他们就不会经常与人见面，也不会沈溺在炫耀性消费中。如果没有公开展示这些物品的机会，就不会有炫耀性消费。

另一个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的转变是关于工作场所和家的区分。因为疫情，工作场所变成家中的一个房间，工作和休闲时间的界线消融——无论是工作地点或时间以及家和休闲时间的边界相较于以往皆更趋近模糊。家空间，已

成为我们接纳全天生活的中心。生活和工作日益交融的结果，使中产白领阶级的家庭关系恶化。另外，由待在办公室转变至在家工作，也意味着人们需要在任何时间都处在准备好能工作的状态。白领工作者表示，自疫情后，他们的主管甚至在深夜传电子信件给他们，并期待他们马上回复信件。主管阶级的期待也转变了，他们期待所有白领阶级的员工随时都能准备好接受像是会议、制作行销计划、撰写电子邮件、准备报告等任务。这些模糊的工作时间，最终导致私人生活中的问题。这些员工甚至难以计划与他的家人或朋友共度时光的时间，即使是如同一起看直播这样简单的计划。这导致了人们缺乏动力与忧郁症比例的不断上升。

总而言之，新冠疫情直接影响并改变了伊斯坦堡中产白领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

來信寄至：

Dicle Koylan

<dkoylan@dogus.edu.tr>

> 土耳其的环境主义社会学

Özkan Öztürk, Karabük University, 土耳其



环境主义可以连结环境运动与公民动员，反抗专制主义。
来源: congerdesign/Pixabay, 创用CC。

在土耳其，环境主义的进程与形式是与该国社会转变及政治同步发展。随着环境主义的转变，除了政治辩论外，也可能发生随着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抗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分裂。

尽管土耳其社会回应环境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回1970年代末，但环境主义组织化直到1980年代末才发生。第一个时期的环境主义组织化，不仅破坏了1980年代军队政变对社会组织造成的心理阻碍，也在1970年代借由夺回抗争语言，建构了新的政治基础，将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相连结。环境主义者的论述超越当时的政治语言，强调正直，并以当时的绿党作为其政治上的代表。然而这个尝试倏忽即逝，因为尽管早期环境主义拥有创新的视野，却受困于狭隘的中产主义实践，难以触及大众。在这样失败的政治尝试后，环境论述持续透过环境无政府组织以不同形式生产。

> 1990年代:环境主义制度化

到了1990年代，环境主义成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环境的价值与中产阶级价值相融合，环境主义也出现在公共领域的视野中。在此时期，环境组织不再只是对环境问题提出政治诉求的社会组织。随着反对国家权威的公民社会扩张，环境主义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元素之一。首先，环境主义非政治的社会形象，使得在政变过程中被去政治化的人们得以重新被纳入社会组织中。再者，关于核电厂计划的潜在风险论述构建，与全国性的工业和火力发电厂所产生的污染，都显示了环境问题并非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的，这也加速了环境主义论述的流通。举例来说，贝尔加马金矿抗争是最广为人知的环境抗争，这个抗争促使环保主义论述在中产阶级间扩散。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成为了环境主义的中坚份子，且延续至今。



土耳其的环境主义抗争。来源：Özkan Öztürk。

对公民社会的强调，促进了不同环境组织与环境主义的观点形成。这个「制度化」时期，使环境组织追求不同目标，以及参与不同社会进程成为可能。非政府环境组织关注不同的议题，如农业、保护自然生命、防止侵蚀，并透过教育活动与参与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来增加社会对环境的认识与兴趣。他们特别关注提高相关知识的活动：近年他们致力于举办儿童和年轻人的环境教育活动，以创造一个对环境具有高度认识的社会群体。

同样在那个时期，不仅无政府环境组织运作制度化，直接针对政治的环境运动也持续茁壮。由于缺乏经济资源，环境运动缺乏制度化环境主义可利用的宣传手段；在此情况下环境运动持续强调环境问题的政治层面，如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和在地抗争来表达诉求。环境运动的政治抗争态度，与制度化环境主义间的共通点，是渴望将环境主义从其政治内容中分离，目的是吸引更多广大的受众关注环境问题。

> 21世纪初：环境主义专业化

1990年代兴起的制度化过程为21世纪初期的环境主义提供了新的观点。相比于1990年代，环境主义组织的议程涵盖了更详尽的目标，也确立自身应该利用何种方式达成目标。这个专业化过程的结果，是环境主义组织厘清了他们对于政治与经济的计划与意识形态立场的知识结构。然

而，许多在大企业的阴影底下所建立出来的，新的「环境主义者」组织宣传的是结合当今经济和政治实践的、驯化的环境主义。这类的环境主义旨趣，不止存在于大企业控制下的组织。特别在21世纪初期，当正义与发展党巩固自身的政治势力，保守派与宗教势力尝试将宗教与环境的论述结合，以扩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样的论述意味着与当前局势和解，而非积极寻求环境问题的解方。

21世纪初，也是环境主义和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注，从中产阶级蔓延到较低阶级的时期。通讯技术如网际网路在环境主义论述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渐独裁的正义与发展党远非和解的环境政策，持续增强问题的根源，使得更大的社会群体被卷入环境议题中。有许多相关案例，如建在溪流上的水电站对所在地区和这些地区的数百个村庄造成的破坏，或通过矿产勘探工程对国家公园的掠夺，都使当地人民在直接感受到环境问题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政治专制。

如今，越来越多人经历了环境议题，这使得环境主义者的论述在公民社会与政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下，环境主义在反对专制政治的抗争，与反对环境议题的抗争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这样的角色化约为其政治性质，将忽略环境主义在土耳其短暂发展历史的路径——除了政治抗争外，发展强调民主价值的公民倡议、通过环境教育开展提高意识的活动，也加强了环境主义的社会素质。■

來信寄至：

Özkan Öztürk

<ozkanozturk@karabuk.edu.tr>

> 卷入土耳其意识形态冲突的女性

Ilknur Hacisoftaoglu ·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 土耳其



2017年，法兰克福妇女游行中的海报，反对管控妇女身体的政策。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女性身体的议题跟许多国家经历过的一样，一直是土耳其历史上各种政治辩论的中心。在本文，我将试着去处理女性身体在不同案例中，如何成为各种政治冲突的焦点。

二十世纪初，在土耳其共和国建设初期，政权定义了什么是共和国的「新女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们的身体行为（例如：她们对服装、运动和活动的选择），被汇整在同一个形式中。女性将透过她们的身体和实践，履行她们对土耳其民族的义务和责任。

这段时期，新成立的共和国的价值讨论焦点之一，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分裂。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创始人认为，西方的文明将透过现代化的样貌进入这个国家。然而，如何保存代表国家差异和特殊性的文化也因此成了一个大问题。女性在这种对立的定位中，同时代表了与西方相较之下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老」女性受到严格的规定把控，她们将被「新」女性取代。这些「新」女性在法律前与男性平等，但仍维持着传统的家庭角色。

正如 Çolak 在〈土耳其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公民身份〉中所说，作为一个新公民，每个土耳其女性都必须遵守一系列反映在她们身体上的「理想化」和「文明化」的符号、形象和仪式。体育被认为是展示新女性的场域，像是土耳其第一位女性赛车手 Samiye Cahid Morkaya，以及 Halet Çambel 跟 Suat Fetgeri，这些都是第一批来自穆斯林国家，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女性。她们也成了那一段时期的象征人物。

> 伊斯兰主义、世俗主义和围绕女性身体的抗争

在 1950 年至 1980 年间，女性社会地位议题的讨论度并不高。在1980年军事政变、土耳其政权转变之后，女性运动才开始兴起。如 Nacide Berber 所说：「独立女性运动的出现，用 Sevgi Çubukçu 的话说，是一场不满足于合法权利的『反抗』运动。它反对凯末尔主义虚构的性别平等错觉，并随着激进和基本教义派的需求下兴起。」

1980年后兴起的另一项运动是伊斯兰运动。这一运动在军政府展开的场域中持续扩大，并在 1990年代增加了影响力。1990年代后，这项运动成为了公认的反运动，在政治议程上处于静止的状态。在头巾的议题上，女性的身体再一次成为公共领域冲突的中心。头巾是伊斯兰主义

>>

者在言说论述上的一大重点，当时的霸权将头巾视为伊斯兰教的象征，将其定位为反世俗主义的形象。因此，妇女不能在学校和政府部门等公共建筑中戴头巾工作。

日益增长的女性运动也影响了伊斯兰运动。随着女性是否能够戴头巾进入公共空间的热烈讨论，加上受到女性运动的影响，使女性在伊斯兰运动，甚至是地方政治中都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2002年，以伊斯兰教为导向的政党AKP上台执政，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场合戴头巾这件事，成为了后续运动的论述核心。他们打造了女性能够自由佩带头巾的论述，并根据女性的权利来形塑自身想传达的理念，正如女性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一样。在早期的共和时期，论述是立基于文明和文化的分裂；而在当前的冲突中则是基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的身体都作为这种冲突的形象被使用。

在随后几年伊斯兰运动兴起，女性身体的讨论也有了新的层次。头巾不再是女性身体的唯一争论。一些伊斯兰意见领袖呼吁女性在身体上不要逾越底线，要好好遵守伊斯兰的价值观。先前女性运动假定得到的权利保障，又再次引起了争议，其中一项里程碑是2011年的《伊斯坦堡公约》。这项公约旨于保护女性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并预防、起诉和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经过一些看似亲政府的报社在几个月的宣传活动之后，土耳其在2012年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这项公约，但却在2021年宣布对这项公约有所保留并宣布退出。事实上，这相关的辩论反映出不同土耳其女性权利议题的紧张局势。虽然恐同是讨论中最明显的议题；但同样具存在感的，是对女性在传统地位的改变感到担忧的政治论述，这些论述正在呼吁那些已经解放的女性重返她们的家庭。

> 女运动员作为一种符号

就在退出《伊斯坦堡公约》而引发的冲击还馀波未平之时，东京夏季奥运会已经展开了序幕。土耳其参加奥运会的男女人数几乎一样，尽

管他们没有赢得任何奖牌，但在土耳其被称为 Filenin Sultanları (「网上苏丹」) 的排球队仍引起了许多关注。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位伊斯兰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推文¹，使球队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成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意义。这条推文呼吁伊斯兰女孩不要像那些被描述成是流行文化一部分的女排球手一样，而要成为谦虚和有礼貌的苏丹子民。这些女性成为了现代土耳其世俗的象征。因此，女排球队很快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女性的身体再次被工具性地利用并转化成伊斯兰—世俗辩论中的象征。

在这些讨论展开的同时，该队一名最成功的球员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与女友的合照。这一次，随着恐同攻击的增加，那些以反歧视言论为她辩护的人，和那些将她视为道德败坏迹象的人，又再一次呈现两极化。然而，就在奥运会之后登场的欧洲女排锦标赛，土耳其队成为了夺冠热门之一。由于这些事态，隶属于政府的土耳其排球联合会发表了支持该球员的声明。联合会表示一个人的私生活属于私领域，除了运动员的成功和对球队的贡献之外，不应去谈论其他话题。不久之后，这位运动员就加入了义大利的一支球队。正如同其他围绕于女性运动员性向认同的辩论，以及 Pat Griffin 在〈改变游戏规则：同性恋恐惧、性别歧视和运动中的女同性恋者〉中所解释的那样，沉默的共识很快就浮现出来，让这个问题结束。

目前，正如 Aslı Telseren 在本文文章中所指出，虽然女性的身体持续被作为政治辩论的工具所利用，但女性仍不会停下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奋斗。■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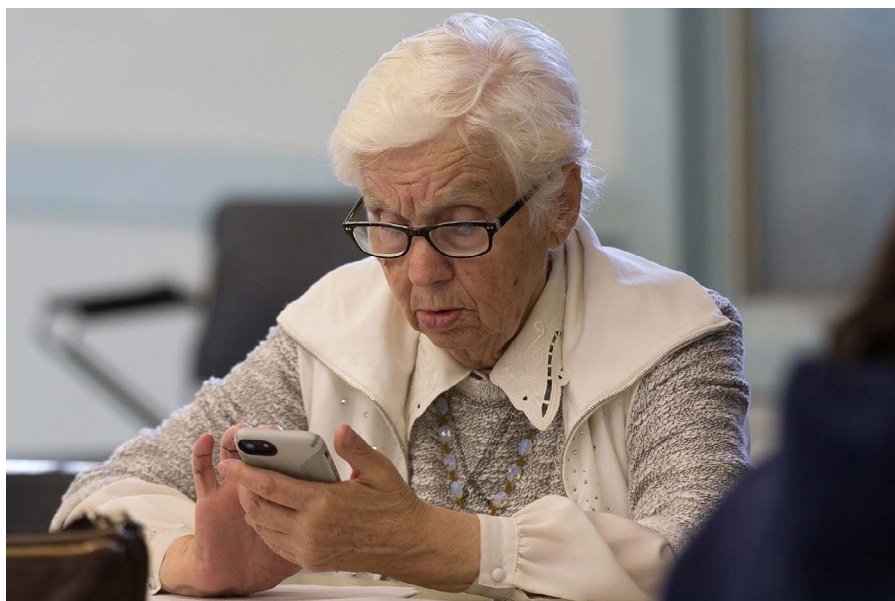
İlknur Hacısoftaoğlu

<ilknur.hacisoftaoglu@bilgi.edu.tr>

1. (土耳其文) <https://twitter.com/ihsansenocak/status/1419296320267997187>

> 土耳其的疫情和「数位移民」

Beril Özer Tekin, Doğu University, 土耳其, ESA卫生和医疗社会学研究小组(RN16)



数位移民在疫情期间使用数位设备的经历。
来源: Oleg Volovik, 创用CC。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土耳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在各个社会阶层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性影响。特别是被归类为弱势族群的高龄人口（65岁及以上），相较于其他社会阶层，其所受影响的过程有所不同。如Butler(1969)指出，随着疫情的影响力增加，「年龄歧视(ageism)」也因恐惧氛围的扩大而浮现。年龄歧视的定义为基于年龄而出现的歧视行为，虽然其与种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本文将聚焦于高龄人口面对疫情相关限制的经验，特别是他们对数位化依赖程度的增加。

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数据，全球人口中有7.03亿人是高龄人口（65岁及以上）；预估至2050年，高龄人口将增加两倍，达到15亿。土耳其的高龄化速度是欧洲国家的两倍，却缺乏相对应的就业和社会服务。考量到人口的「白发化」，我们有必要针对全球和土耳其的高龄化进行更多研究。

> 年长者作为「数位移民」

随着网际网路使用者的数量增加和许多公共服务的线上化，二十一世纪的数位化进程正在加速中，但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平等地接触到数位技术。除了经济和教育变数外，年龄也会造成不利。「数位移民」(Prensky, 2001)点出年长者进入数位领域时会遭遇的困难。它所指的世代是在电脑技术大众化之前就出生、在晚年才接触到这些技术的人。这与数位移民的年幼儿孙，与新技术同时出生的「数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形成对比。在数位原住民的帮助下，数位移民们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开始提升。

TURKSTAT(土耳其统计研究所, 2020)的资料显示，土耳其65-74岁个体对资讯科技的使用于2015年至2020年间有所增加。高龄用户的比例从6%提升至27%。最常使用的设备是智慧型手机：根据研究资料(Binark等, 2020)，土耳其57%的女性和60%的男性会使用智慧型手机造访网际网路。

>>

年长者见证了媒体和通讯的重大转变，从报纸和广播开始，接着是智慧型手机、智慧型电视和触控萤幕。这个以前习惯于寄信和等电话的世代，正在努力适应资讯流通、通讯、通讯速度都提高的新时代。多亏了数位化，年长者才得以在疫情期间的层层限制中享有自由和快乐。另一方面，数位平台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资讯污染、错误资讯、诈骗和语言传递错误使用错误的语言。

> 疫情期间年长者的数位使用

在疫情期间，年长者更频繁地参与数位化过程。他们面临了严格的限制，例如限制离开住家周围的宵禁（2020年3月22日）和禁止使用大众运输工具（2020年11月）。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限制给年长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那些无力负担计程车或私人载具的人。他们的心理和生理脆弱性因疫情而更加被凸显，尽管需要药物来治疗诸多健康问题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脏问题和心血管疾病等，他们仍无法去做检查或调整用药。

不幸的是，年长者要面对的是社会上的标籤、污名和歧视。除了现有的健康或心理问题外，媒体上的歧视性语言使年长者感到被孤立、被社会排除在外。在这个艰困时期，他们从家人和孩子那里获得了最大的社会和心理支持；对这一代高龄人口的负面影响有可能会持续数年。除了政府端的限制之外，年长者还需面对孩子对他们日常行为施加的限制，例如购物、拜访邻居或与朋友见面，这些压力和控制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和焦虑。他们不再去看邻居或朋友，也不再去购物；改为孩子为他们购物，或开始使用线上购物。这导致他们更常为了线上购物以外的目的使用网际网路，例如视讯通话和与朋友社交。脸书、Instagram、推特、YouTube和WhatsApp等在疫情期间成为年长者最偏好的应用程序。

年长者发展出一套应对策略，例如体育活动、步行、上网、看电影和其他疫情期间可行的嗜好（阅读、缝纫、冥想、参加线上课程）。这些活动有助于他们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虽然多数年长者一开始并没有步行的习惯，但他们在疫情限制期间采用并维持了步行。

最后，网路和新媒体技术是疫情期间重要的缓和机制。网路和社群网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年长者应对问题、提供社交和娱乐的机会。我发现年长者使用网路的效率相当高，取决于教育、经济和社会因素。新技术对于加剧的老龄化过程中减轻日常琐事和健康独立的生活十分重要。有鑑于当今疫情期间对年长者、女性和穷人等弱势族群的不平等加剧，我们更应该为这些群体提供网路服务、获取智慧型设备的经济补助，并由相关机构办理使用教学。■

來信寄至：

Nazlı Beril Özer Tekin

<btekin@dogus.edu.tr>

> 超全球化到永续合作的路径选择

Hans-Jürgen Urban, 德国金属业工会,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国

全球的社会学研究一直都有在关注资本主义「超全球化」(Dani Rodrik)带来的社会和生态扭曲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这套模式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创造了迥异的劳动条件。而主导这些供应链的,通常是将总部设在资本主义北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其供应商通常是在全球南方的公司。

> 全球供应链的不对称

全球研究表明,这些供应链上的劳动条件严重违反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劳动和人权的基本标准。从代表资本主义的北方世界,其原始设备制造商,到全球南方的中间产品制造商(供应商),劳动条件和健康风险都有越来越差的趋势。再加上各地危害健康的环境因素有所不同,因此呈现了地理差异。

如果不消除实际劳动条件和理想的法律与道德规范之间的明显差异,就无法从超全球化过渡到永续合作。工作负荷和健康机会的不对称分配结构是反复造成工人抵抗和工会倡议改革的原因。但是改变很难实现,因为工作负担被不对称的分配,同时利润与成本也分配不均。不变的供给-生产关系带来的经济优势全集中在资本主义北方国家的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拥有者身上,从而使既得利益者继续获益。迄今为止,仅有少数案例成功在供应链上建立工会的权力结构,或能说服大都市政府引入有效的社会和生态法规。

> 资本主义全球化来到了临界点?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映照出了资本主义超全球化的阴暗面,对这整个体系的获利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协调的「野蛮保

护主义(wild protectionism)」再次出现,撕裂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创造过程。销售市场突然关闭,初级产品缺乏导致生产线中断。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新的供应商并开闢替代的市场,但提高的采购成本和额外的市场开发成本仍然造成了压力。

第二波进展是,在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可靠的有酬工作呈现不稳定和碎裂化,进而导致部分劳工陷入更弱势的处境。他们的工作形式可能是雇佣劳动或自僱工作,在工作、健康和环境负荷等面向上面对不同程度的劣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德国,这个恶劣的情况在从事肉类行业的东南欧移工劳动条件中变得很明显。即使是德国立法者所制定的最低限度卫生和感染保护措施规定,在德国工会施压前,这些都不可见。媒体对非法和不人道条件的报导也造成负责企业和政治人物相当大的压力。

第三波发展是欧洲的立法干预,要求总部设在欧洲的公司负起尽职调查的义务,这有机会对南方供应商的劳动条件产生正向影响。例如,德国在社会联盟的压力下推行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德文Lieferkettensorgfaltspflicht-Gesetz)。并在2021年,欧洲议会批准了企业尽职调查与企业责任指令草案。虽然这些规定的成效仍是未知,但它们也可以作为小公司和工会倡议的起点。

疫情再次地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对于过度全球化的风险及合理性的辩论。例如,德国经济学家Sebastian Dullien质疑,生产经济的全球化是不是已经过了最佳时刻,全球化的边际效益已经无法弥补它带来的风险。有鑑于金融市场危机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伤害,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工会和其他行动者需要找出

>>

「目前为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有可能沿着供应链建立工会权力结构，或者说服大都市国家的政府引入有效的社会和生态法规。」

改变既有的全球化路径的可能性。为日益脆弱的全球化付出代价、对过度剥削移工的警觉，以及加重跨国公司尽职调查的措施，都在创造新的条件，以对全球经济进行社会和生态上的规范。

> 全球公共社会学的研究路线

对于全球社会学对话，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历史性的时间点，批判性社会科学能如何帮助改善劳动条件？首先，全球生产链所在国家的研究人员必须在社会学的自我理解和研究路线上形成共同想法。Michael Burawoy 对全球公共社会学的箴言是一个合适的基础，这已经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生态会有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以了解在全球生产链中实施社会-生态规范及其最低标准有关的利益、策略和阻碍。

经济、生态和法律相互关联的问题也会需要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和人权取径的研究相互搭配。永续再生产的劳动、社会和自然等各种面向可以搓揉到共同的研究问题中。劳动阶级环保主义研究或环境劳工研究可以作为开始。

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也是必要的。尝试借由组织跨国联合组织来整合国内工会的权力资源，迄今为止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沿着全球生产链去建立工会权力架构也面临重大挑战。特别在南方的工会和公司导向的利益集团中，经常面临财务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国家和工会传统之间的文化分歧也是挑战之一。研究必须探索，共同承受超全球化后果的经验是否也可以促进共同制定战略的过程。

> 远景

社会学研究显示，从超全球化转变到永续合作体制过程中的阻碍，与其说是因为缺乏知识，不如说是因为利益和权力结构。要消除这些阻碍不能只透过新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增值逻辑的质疑，也可以开启一扇机会之窗。如果全球社会学界能带着这种批判性研究的新意识，那么新的合作场域和新的全球公共社会学的机会就会出现。■

來信寄至：

Hans-Jürgen Urban

<Hans-Juergen.Urban@igmetall.de>

> 大自然的反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弗克林根钢铁厂

弗克林根钢铁厂(<https://voelklinger-huette.org/en/>)是现存唯一来自工业时代的完整钢铁厂，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展示了大自然如何回归这个生产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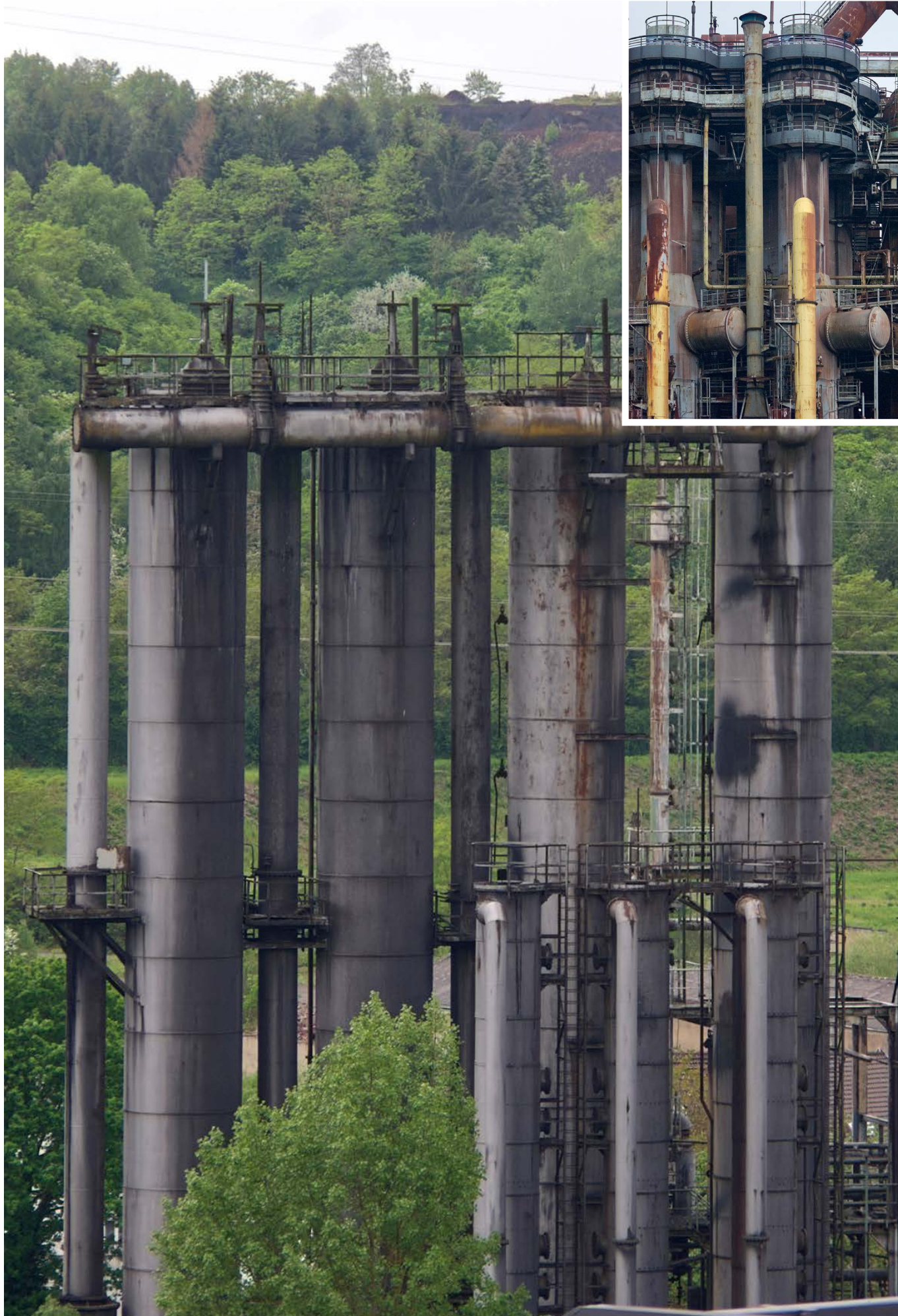
摄影为 Max Aulenbacher。以下由全球对话展示的照片，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弗克林根钢铁厂的公关部门提供。■

来信寄至：

Max Aulenbacher

<max.aulenbacher@t-online.de>







> 为什么要向上看？

Karl Polanyi 谈右翼「民粹主义」

Sang Hun Lim, Kyung Hee University, 南韩



来源: Ivan Radic/[flickr](#)。

那些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忽视的人，将近期兴起的激进右翼政治解释为民粹主义的社会保护运动。社会评论家批判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以「第三条道路」的名义接受市场经济，转而关注性别、种族等身份政治，却忽视社会和经济阶级的不平等。他们提议推广「左翼民粹主义」作为解决方案，借此将中下层和工人阶级从激进右翼的论述，重新定位到更加开放和平等的进步民粹主义。

我的文章(「[向上看胜于向下看](#)」, *Current Sociology*, 2021年, 优先电子发行)便是想要质疑这样的观点: 认为心烦意乱的「人民」是右翼政治兴起的原因。将激进右翼政治认定为民粹主义, 并不能解释许多中上层「菁英」也支持激进的右翼政党和政策, 以及大多数激进右翼政党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工作逻辑。他们不分国籍的谴责接受社会福利的人。波兰尼(1886-1964)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所写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 对理解激进右翼政治具有启发意义。波兰尼是众所周知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者。他用「双重运动」的概念——自我调节的市场和对应的

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在他看来, 是崩溃)。因此, 尊崇波兰尼的学者经常将激进右翼政治解释为大众反对资本主义破坏的一种社会保护运动。然而, 波兰尼本人将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菁英为了保护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而进行的极端运动。

>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和法西斯主义

波兰尼认为,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资本家试图使经济不受到「大众」的干预。自我调节的市场将劳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 侵蚀了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些因为这种「虚构的商品化」而被剥夺生计和社会关系的人可能很想保护自己免受自我调节市场的侵蚀。对于那些希望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人来说, 大众对经济的保护性影响会扭曲市场的「自然」功能, 从而导致生产力低下, 最终导致马尔萨斯式的末日。

从历史上看, 资本家在保护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之间曾找到妥协路线。然而, 经济急剧下滑导致来自民主的压力增加, 最终导致双方陷入僵

局。这就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情况。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条拯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简单的出路」，借由破坏民主制度并将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社群主义体制，约束人们为「共善（common good）」做出有生产力的贡献。波兰尼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战间期的法西斯领导人是在没有政治和经济菁英的支持下获得政治权力的，即便是希特勒也是如此。

当然，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并不完全相同。常被指出的差异是，当前的激进右翼政治人物经常开放地接受民主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激进右翼政治往往会导致其民主退化成「非自由民主」，甚至「选举独裁」。此外，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政治动盪也可看出，即使是选举这样基本的民主制度，也可能在看似稳定的民主社会下备受挑战。

> Polanyi 的法西斯主义和当前的右翼政治

正如我文章标题所暗示的，波兰尼告诉我们，在分析激进右翼政治的崛起时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为了防止激进右翼政治的胜利，我们需要努力区分上层和中产阶级，至少要像团结下层和中下层一样努力。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菁英集中可调动的资源和资讯，打击进步政府推行的社会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在战间期加剧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僵局，并为巩固了以法西斯作为解方的基础。

我们如何划分上层和中产阶级菁英？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份政治的重组淡化了社会阶级和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性。这种重组将上层和中产阶级分开，将其中许多人吸引到进步的那边。当然，正如 Nancy Fraser 以「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者」所进行的批评，忽视阶级冲突和经济不平等是有危险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身份政治的议题也让许多中上层阶级者与进步党派结盟。

另一种划分菁英的可行方式是普遍性的社会政策。Thomas Piketty 著名的研究呈现了财产上的不平等远远地超过收入上的不平等。许多年轻专业人士，他们收入丰厚但资产贫乏，希望能在面对未来收入渐少及因为技术和产业转型而导致的专业价值下降时，可以有一份保障。进步政党可以推动普遍性的福利政策，不仅有利于下层阶级，也有利于中上层的专业人士。特别是，结合连动收入的社会保险计划与费率齐一的平等再分配体制，可望吸引那些高收入低资产的专业人士。

> 结论

将右翼政治解释为「民粹主义」社会保护运动，让我们「向下看」，将右翼政治的责任推卸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波兰尼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促使我们「向上看」资本主义菁英。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资源和资讯，激进右翼政治人物很难获得政治权力。波兰尼提醒我们，尽管他们发表了各种民粹主义言论，激进右翼政治人物们始终是支持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接受波兰尼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赋权解释为菁英们尝试保护自我调节的市场，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分裂资本主义菁英，并且促进下层阶级之间的团结。■

來信寄至：

Lim Sang Hun

<limsanghun@khu.ac.kr>

> 从杀人犯的故事中学习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Oslo University, 挪威; ISA传记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38)成员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圣马丁监狱(小图)和德沃托联邦监狱(大图)。来源: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从社会科学、心理学到法律、文学和电影,许多领域都会讨论凶杀议题。正如 Oriana Binik 所说,一系列的学术和民间理论都在说明人们对暴力的迷恋,这些理论针对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议题提出叩问。然而,妖魔化、神话化、病理化,或是预设肇事者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减损了我们去理解其背后的社会过程的可能性。

这个主题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很少人会研究杀人犯的故事和传记,把犯人自己的说法和逻辑纳入考量。学术研究从微观、中层和宏观各层面开展人们对暴力致死的认识。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合理地开拓了从统计分析和关键变因(如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探讨,但它不利于做叙事过程的全面分析。

> 杀人犯的世界观:呼吁一种基于经验的理解

暴力人类学的先驱 David Riches 指出该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暴力」往往是目击者和受害者所使用的术语,但暴力行为者的主观解释却是缺乏的。因为过于关注量化数据,犯罪者经历及合理化暴力的具体方式鲜为人知。

我们可以从罪犯的角度学到什么?他们的故事和生命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男男凶杀案?利用叙事犯罪学分析,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了解罪犯所使用的叙事,并分析这些事件在他们的故事中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在设计上避免了本质主义分析,并试图强调暴力行为的意义在每个社会群体中都是历史的、文化的建构。

>>

> 叙事与传记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是72份对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男性犯罪者的叙述性访谈。为了符合抽样标准，受访者皆是因争吵和人际纠纷而被控蓄意杀人的人。访谈是配合受访者选择讨论的叙事和时间。分类过程——抛开个人经历和信念——在分析中至关重要。田野观察则是在联邦和省级监狱以及服满刑期的男子家中进行。

每个受访者都会收到他受访过程的逐字稿，并与受访者合作撰写一篇简短的生命故事重现。遵循开放和轴向编码的过程。本文重点关注两个主题：传记转折点（被认定为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刻）和理由（受访者对事件的解释）。

> 暴力致死：意义和故事

探索罪犯如何赋予凶杀意义是一项有趣且丰盛的投入。关于男性犯人如何表现跟说明暴力致死，有三个主要的发现。

首先，他们会以多样化和变动的方式谈论和表现身体暴力。暴力被描述为自发的、自然的、在特定情绪状态下的逻辑判断或一种动态情境；暴力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一种惩罚形式，以及一种恢复荣誉、男子气概和地位的做法；暴力也可能是一种非蓄意的行为，或者是当时社会处境下的不幸事件。暴力作为一种实践和一种资源，是个有多重价值的行动。为了中性化和合理化它，男人选择以缺乏能动性、转移自责感，并让自己符合与某些主流的叙述（「我别无选择」、「是对方自找的」、「我失控了」、「这是我的成长经历使然，而不是我」）。因此，暴力从不缺乏意义，它终究是行动者使用的合理资源。

其次，与我最初的假设及心理健康领域的霸权理论相反，这些理论以暴力行为的「创伤」性质将其病理化，凶杀事件没有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他们被父母遗弃、在金融危机下失业、戏剧性的分手、获得或失去朋友，最值得注意的是，入狱是

他们生命故事中的重大转变。这些事件改变了他们的「自我」以及他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然而，凶杀案本身很少被呈现为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刻。

监禁，而不是杀戮，被描述为重大事件与这个机构对他们的意义有关。它被表示为他们生命中「谷底」的时刻，一个改变和重塑他们生命历程的机会，一个从过去的自己中得到的救赎，甚至是一个被社会决定的事件。

第三，监禁、凶杀和先前严酷的生命事件被呈现为「学习经历」。受访者普遍使用偏向正向地评价有害经历的叙事。监禁、打架、与亲友失去联系被解读为成熟、个人成长、主体转变或强化的时刻。一次暴力死亡事件可以开启一个新的「自我」。这种理由与霸权阳刚气质文化密切相关，也与监狱中不断重复的形塑故事的论述（即心理学、生命教练、宗教、康复和社会工作）密切相关。

> 結語

正如社会互动论者几十年来所强调的，维护社会行动者的观点是必要的，这有助于理解社会事实并避免在既有的科学范畴内解释它。虽然关于凶杀的学术理论有非常多——提到死亡对罪犯的人生而言几乎普遍是「创伤」影响——但只有关于意义建构的经验探索才能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个现象。在学术和常识中，杀戮与特定时刻和非理性、疯狂或不道德的行为有关。这项研究表明并非如此。

重新检视现有的资料、理论、框架和体制，他们赋予暴力特定的意义，却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去支撑一种有价值的探索方式，与此相关的研究仍待更多的探讨。■

來信寄至：

Martín Hernán Di Marco

<mh.dimarco@gmail.com>

> 巴西数位平台的 的貨運工作

Bruna da Penha 和 Ana Beatriz Bueno ·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UERJ) · 巴西



疫情之初，巴西的送货劳动者。
来源：Marcelo Renda/[Pexels](#)。

根据经验数据与社会学式的思考方式，我们对于在疫情期间的巴西货运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查；同时也分析这样的冲击是否影响劳动者们对于不平等的主观认知。在研究中我们假设：健康危机并未造成不平等现象的诞生，而只是加剧了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说，疫情期间货运劳动者的健康危机，使他们更可能面临在工作条件上（如：工作时数、薪水和风险）的恶劣情况，也加深了劳动和资本的冲突。我们使用巴西数位平台上一百名货运劳动者的样本作为原始资料库，透过参与者在谷歌表单上所提供的答

案取得这些资料。而研究的参与者位于巴西东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最后，表单回收的时间落在2021年的3月至5月间，其中包含量化与质性的资料。

> 优步化与劳资冲突

我们绝不能将劳动的优步化(uberization)作为史无前例的状况，而是应该将其置于社会物质中去理解。也就是说，它并非自古以来资本积累模式的不一致或偏差。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关系，是优步化工作的特征之一；要解释此概念，必须由过去生活意义遭受「公有化」的现象出发。这是资本主义中劳工从属性的社会状态，因此它与法律地位的讨论是无关的。

>>

虽然不能将劣步化解读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但我们必须去理解此现象在当代是如何被呈现的。以巴西货运劳动者而言,劳动者和平台对于不平等现象看法上的差异,多源自于双方日常生活和在城市中工作经验的鸿沟。即使工作过程的碎化变得日益严重,但劳动者们穿梭于城市和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使他们对于这段工作经验有着与平台绝然不同的感受与看法。

此外,货运活动的关系性,也揭示了人类工作的本质:其作为一个过程,成为了现实的中介、使互为主体的关系得以发展。这样的观点,对于理解不平等现象,以及抗议活动的集体表现,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接着说明由此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研究结果。

> 谷歌表单上的问卷调查

关于疫情期间货运劳动者的每日工作时数:有42%的人表示他们每天至少工作9到12小时,20%的人每日工作有8小时,13%的人则每日至少工作13小时甚至更多。另外,我们也询问疫情前的工作时数?以疫情前已任职于此行业的(共66名)受访者为样本,有39.3%的人每日工时为9至12小时、22.7%的人每日工作8小时、9%的人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从数据来看,疫情间货运劳动者的工作时数确实上升了。

至于他们在疫情间的月收入,有25%的人表示薪水仍平均低于巴西的最低薪资(在当时约为1,100雷亚尔);23%的人表示其落在1,100至1,650雷亚尔间。另外,有15.3%的人说明,他们在疫情之前的报酬就低于目前的最低薪资。约有37%的受访者强调在疫情前赚得约2,750至3,300雷亚尔的薪资,但如今只剩15%的人得到同样多的报酬。资料显示,即便货运服务的需求与劳动者们的工时皆大幅增加,但他们的月收入却大幅度下降。

因此,清晰的数据显示了每日工作13小时以上,以及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受访者的比例明显增加。「薪水多寡」看似就是劳动者们对于在平台工作上产生不平等感受的最主要因素;更何况,有多达84%的受访者表示这个工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说,对巴西的货运劳动者而言,这工作并非只是打零工赚外快的作用,而是份不可或缺的薪水。

由劳动者们对于平台要求改善的方面来看,有91%的受访者皆要求薪资的调涨,其余的要求还包括:改善不当封锁的问题,对于意外险、膳食津贴、自治权、劳工权益与劳动契约的保障。在社会的危机加剧之际,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同样恶化且更为显着。以不平等关系的货币层面切入观察,我们发现它最能具体地显现劳动的社会矛盾。

至于人们从事货运工作的原因,大部份的受访者皆有着相似的回复:他们需要一份收入来糊口饭吃。以社会人口学的概况来看,98%的受访者为男性,54%为有色人种(年轻人佔多数)。另外,有24%的受访者年龄介在31至35之间;19%的人为21至25岁;再来是35至40岁的人,佔受访者的18%;最后,25至30岁的人佔了17%。上面的数据反应了一项事实——年轻人是受失业影响最大的族群。在他们的教育程度方面,有77%的受访者拥有高中或大学学历。最后,33位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遭受过职业伤害,但平台只愿意提供相当少的援助。以上这些数据揭露了在疫情期间,劳资冲突的矛盾与不平等愈加严重的情况,增强了货运劳动者们在工作中的不稳定性。■

來信寄至:

Bruna da Penha

<brunapmcoelho@gmail.com>

Ana Beatriz Bueno

<anabeatrizbuenoadv@gmail.com>